

第9卷第3期 2016年6月

Vol. 9, No. 3, June, 2016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大学创新的“特制酱汁”是什么?	43
国际分校: 一种现象的演变.....	46
印刷版学术著作的终结: 崩塌的市场和新的模式.....	49
论功行赏	52

国际化

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全球.....	54
国际化的国家政策——产生作用了吗?	57
就业机会是学生流动的一大助力.....	60
国际教育市场: 一些新兴趋势.....	62
行政人员对国际化的价值.....	65

关注巴西

巴西科学无国界的兴衰.....	67
高风险的入学考试: 巴西视角.....	69

非洲发展

突尼斯大学中伊斯兰教徒与不信教者的分裂.....	72
弗朗茨·法农和南非的“必须倒掉”运动	74
生死攸关: 南苏丹高等教育的困境.....	77
非洲博士教育面临的挑战.....	79

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斯坦: 质量保证——国家标准重要吗?	82
哈萨克斯坦的大学治理改革.....	84

欧洲

私立高等教育: 即便是法国, 即便是营利.....	86
欧洲大学的绩效拨款	88
新书速递	91

大学创新的“特制酱汁”是什么？

Philip G. Altbach、Jamil Salmi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Jamil Salmi: 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高等教育项目协调员、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电子邮箱: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正与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 (the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在其新的以技术为导向的康奈尔科技园区上进行合作, 该园区位于纽约市。《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近期的一篇文章写道, 康奈尔大学此举是为了利用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开创精神, 而并非是该研究所中任何特别的组织创新, 这与世界上许多顶尖的重视研究和创新的大学有着共通之处。

由于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教授们领导着纽约的康奈尔科技园区, 所以该校更多关注培养“衍生人群”而非“衍生公司”。尽管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培养敢于创新的毕业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42%的毕业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但是, 这未必能在纽约实现。在院校文化中实现学术文化或是特定创新的转移并非易事。

麻省理工学院或是其他院校带来的经验教训？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案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无疑, 麻省理工学院培育了一些世界上最优秀且最具创新精神的毕业生。而且, 该校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文化, 催生了创业精神和新的

理念。麻省理工学院雇用了一些全球范围内天赋异禀且善于创新的教授, 并确保他们适应大学的氛围。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它推动把校内产生的知识转化为产品和创新并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际应用的过程。另外, 大学为那些希望实施其想法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支持。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麻省理工学院应邀去帮助其他国家的大学发展“迷你麻省理工学院” (mini-MITs) ——提供“特制酱汁”以将一所资源丰富的院校转化为创新及创业型的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已参与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 在某些情况下是帮助建立新的大学, 另一些时候则是提供大量输入以发展现有的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帮助下建立的院校包括: 莫斯科斯科尔科沃科技研究所 (the Skolkov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阿布扎比玛斯达尔学院 (the Masdar Institute)、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另外, 麻省理工学院葡萄牙项目援建了科技系统, 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所 (the Cambridge-MIT Institute) 与英国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在各类项目上合作了数十年。

虽然这些项目的全面分析尚未公布, 可

以公平地说，所有项目都面临着挑战，还未有任何一个项目在获取“特制酱汁”（即麻省理工学院成功秘诀）中有任何实质进展。所有这些举措都得到了合作机构或是捐助者的慷慨解囊，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些都显示了把学术文化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的难度，而这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尤为复杂。

麻省理工学院与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并非是康奈尔科技园区的仅有参照物。还可以看看其他关注产生创新的非常成功的大学模式。在孕育创业公司及培养为硅谷的信息技术和相关领域做出不凡贡献的毕业生上，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取得了巨大成功。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在技术教育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它与工业和技术的联系及在此之上做出的贡献也广为人知。两者都与麻省理工学院差异巨大。虽然将卓越品质与产业贡献相结合起来的大学为数不多，但仍有许多不同的模式相当有用。

关键配方是不够的

搞清楚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的主要需求并非难事。我们的著作《学术卓越之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建设》（*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World Bank, 2011）提供了成功的新型大学的案例研究。所有大学在短时间内都在科研上有了实足进步，且大多数学校为其国家做出了贡献并在全球排名中取得了飞速进步。但是，在组织或是学术特征上，没有一所学校可被称作是具备独有原创性的。

创建一个新型研究型大学所需的关键因素包括以下几点，充足的财务资源以启动项目及维持长期的卓越；涵盖学者积极参与而

非学者完全控制的治理模式；强有力的领导，不仅包括远见卓识的校长，也包括能够实现大学使命的专业行政人员；不受政府或私有部门干预的自主权，但要承担合理范围内的外部问责；在教学，科研和出版上的学术自由；致力于大学使命（包括教学）的顶尖学术人员，学校给予其丰厚酬劳并为其提供合理的职业阶梯；高素质且积极进取的学生；对各阶段英才教育的坚定承诺。

这些元素都没有提供“颠覆性创新”，即许多人认为的 21 世纪大学卓越所必须拥有的特点。所有元素都是近百年来成功大学可靠且真实的特征。没有哪所大学是完美的，但所有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即便不包含所有的特征，也拥有它们中的大多数。这些都是大学卓越的“普遍原则”。

颠覆性创新

这里讨论的特性并不保证创业活力，或是动态的创业文化。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或许会发现在输出其创业文化上，它与麻省理工学院面临同样的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一所大学向另一所大学传送一个高度复杂的学术文化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模仿，复制或适应他人的成功配方并不容易。创新高校产生于反映原创愿景独特的价值定位之中，并在把这一愿景变为现实的能力之中得以发展。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1）在新的多学科领域中的专有项目，（2）互动、协作和体验式教学和学习方法，也许最重要的是，（3）21 世纪的能力（主动性、团队合作、沟通）和积极的性格特征种类（好奇心、勇气、社会责任感）的独特结合，从而激励优秀的专业人才和成功的变革推动者。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富兰克林瓦特欧林工程学院（Franklin W. 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可能是最佳案例之一, 它可以说明设立一个新的、真正创新性的院校需要什么。欧林学院于 1999 年开始运行, 它拥有一些大胆前卫的特质: 提供试验性的实验室以改造美国的工程教育。欧林学院在运营中带有几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它的课程以独特的方式将工程学、创业精神和人文学科相结合。欧林学院受益于欧林基金会大量的启动资源, 并在创立之初提供免费教育。欧林学院招收了这样一批老师和学生, 他们相信学校的创新使命并愿意投身于这所新建的院校之中。欧林学院的成功印证了在调整其他地

区现有成功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本土”模式的益处。

结语

也许, 在高等教育中发展创新的通用“特制酱汁”并不存在; 另外, “颠覆性创新”未必总是带来积极的改变——事实上, 彻底变革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后, 大学发展的真理终归是建立创新的最佳途径。但是, 在外部技术的援助之下, 以色列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创新基因是否能在其他地方得到有效推广还需拭目以待。

国际分校：一种现象的演变

Kevin Kinser、Jason E. Lane

Kevin Kinser: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管理和政策系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Studies) 副教授、跨国教育研究团队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联执主任

电子邮箱: kkinser@albany.edu

Jason E. Lane: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协理副校长、学术规划战略领导副教务长,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跨国教育研究团队联执主任

电子邮箱: Jason.lane@suny.edu

国际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体现了跨国高等教育渐增趋势的一个要素;通过设立国际分校,大学在许多国家实现了真实的存在。自2009年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跨国教育研究团队就开始追踪世界范围内此类院校的发展。事实上,国际分校正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格局中更为成熟的一部分;基于我们的研究,我们指出了三个领域,它们关注国际分校全球新角色以及分校所处的变化情况。

发展和多样化

尽管诸如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迪拜分校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新加坡分校等失败案例相当引人注目,但全球国际分校市场的整体情况仍然良好且不断发展。跨国教育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共有230所国际分校处于运行之中。据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the Observatory for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报道,这一数字较之于2009年正在运行的160所分校增长了44%。

这一增长趋势相当显著,但也伴随着失败的发生。跨国教育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

至少有27所分校关闭。该数字超过了现有国际分校数量的10%。鉴于这些机构大都是与处于初始阶段的创业公司类似的企业组织,这样的失败率也不足为奇。实际上,考虑到高科技领域的创业公司在三年中有90%的失败率,国际分校的失败率实在是非常之低。

但一些分校已相当成功。尽管大多数国际分校仍然规模较小,且集中于利基市场(小众/专门市场)的少数学位领域,但这样的需求足以维持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分校了。依据我们现有的统计,至少25所分校都招收了2000多名学生。最大的分校——中国西交利物浦大学(Xi'an Jiaotong Liverpool University)、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马来西亚分校以及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越南分校(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各招收了6000多名学生。甚至在那些国际分校趋势不显著的地区也存在大量招生,比如威斯敏斯特国际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分校(Westminst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Uzbekistan)和乔治亚理工学院法国分校(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跨国教育研究团队的数据也表明了教育输出和输入国的多样化。现在,有32个国家向另外75国输出教育,该教育流动不是简单的自西向东和自北向南。事实上,俄罗斯是

第三大教育输出国，资助了20个海外分校。即便是美国现在也有五所国际分校，其中至少有两所处于发展阶段。

与接收国政府建立关系

历史最为悠久的分校得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韦伯斯特大学(Webster University)的资助，它们趋于遵循母系院校全资赞助的模式，在基本不受接受国管理制约的情况下运行。而最近，接收国政府的参与变得更加普遍，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现在，很少有接受国政府不以某种方式实现参与(国际分校的管理运行)，但它们采取了各种方法，从自由放任的政策到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例如，迪拜——最大的国际分校输入国之一，已对国际分校发展采取了自由市场的方法。政府希望接收大量的国际分校以为大量外籍移民人士提供教育，但政府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学术计划，这使得国际分校只能自己去发展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并面对市场的机遇。

其次是卡塔尔，它采用了更为集中且更具战略性的途径。政府挑选希望与之合作的院校，规定这些院校提供的项目并予以涵盖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的大量补贴。

中国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所有的分校都以正规的中外合作企业组织管理，中方是主导方。例如，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近期建立的分校都被视为新的中国大学，它们是中国教育系统中独立的实体。

推动质量保证

政府和院校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分校的质量保证机制。在多数情况下，国际分校应该提供与学校本部相当的学术项目。诸如佛罗

里达州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等院校明确要求分校的学术项目与校本部一致，并且这些学术项目也遵循类似的审批流程。然而，一些设立海外分校的大学和接收国开始认为分校具有特殊的属性，不应被归为母系院校的从属机构。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马来西亚和中国分校拥有大型的学术项目，这些项目具备引领课程发展的能力，而非仅限于跟随校本部的发展趋势。纽约大学和韦伯斯特大学已提出这样一个模型，所有的区域都被视为一所全球大学的一部分，这就减少或甚至是拒绝了校本部和分校存在差异的想法。

我们也发现国家质量保证机构在关于如何评估跨国教育上变得愈发复杂——一些机构认为国际分校是独特的教育实体，并据此调整其政策和过程。迪拜建立了一个新的质量保证系统，即大学质量保证国际委员会(the University Quality Assurance International Board)，以确保分校与校本部的质量相当。其他的教育系统，例如中国台湾，则将外国机构的质量保证决策与其自己的决策一视同仁。同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学本部的尽职评估已取代了代表第一代分校的运气和人际关系。这使得分校领导、更好的商业和财政模式、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意外状况减少了许多。我们过去常常看到每条宣传语都在吹嘘五年内将有一所拥有一万名学生的校园，而现在，节奏缓慢且有计划的、谨慎的推广才是准则。

结语

这一关于分校新方向的回顾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跨国高等教育司空见惯。它应被视为所有国家思考其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可行且重要的选择。第二，大学结构和监管体系要适应新的教育形式；新形式也要适应这一体系。这种适应是一个重复

的过程；我们应该期待的并非一副静态图景。第三，作为国家主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国际分校的国家策略要得到重视。这意味着政治风险要与学术风险一起被考虑在内。规定可以依据本地诉求快速改变，外国大学或许会突然发现其赞助者失去权力。第四，国际分校日益融入国际监管体系引发公众对于接收国普遍的西方学术自由保证的质疑。学术自由的定义也常备受争议，因为国家对政治自由的界定与对学者在海外分校中自由教学和进行科研的能力界定完全不同。外国大学和接收国建立对其不同体系的共同观点相

当重要，我们应寻求妥协与适应，而非严格遵守一种观点。

最后，国家如何回应吸收外国院校为其教育和治理哲学提供了讯息，或许也会为国家将如何对其他形式的国际化做出回应给出指引。

注：《国际高等教育》定期发表跨国教育研究团队的贡献，该组织总部位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cbert.org.org/>。

印刷版学术著作的终结：崩塌的市场和新的模式

Donald A. Barclay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电子邮箱: rossaw@unimelb.edu.au

纸质印刷学术著作的全球市场，即学术界“不出版就淘汰”(publish or perish)的文化壁垒渐已濒危。印刷版的学术著作销量触底，而每本书的价格却达到历史新高。

惨淡的销量与上升的价格

以图书为中心的历史学术领域就是体现销量如何下降的示例之一。1980年，对于任何一本历史著作，学术出版社都可以预计卖出2000本。到1990年，这一数字暴跌至500本。而到了2005年，在世界范围内卖出200多本则是常态。销量的下降在其他学术领域也同样可见。

世界上的出版社通过提高价格以应对学术著作销售量的减少。同样以历史领域为例：1980年，一本精装历史著作的均价为22.78美元；2010年，价格几乎上升了四倍至82.65美元。价格的上涨在其他学术领域也同样可见。

大学图书馆濒临危机

学术界经历的既非异常也不是巨大冲击，而是市场的崩塌。根本原因在于大学图书馆购买力的丧失，包括相对富裕的北美和欧洲的大学图书馆。传统意义上，大学图书馆是印刷版学术著作的最大买家，但在数十年期刊订阅价格不断攀升的过程中，大学图书馆别无选择，不得不缩减在购买学术著作上的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图

书馆在期刊和著作上支出的比例大约是50:50。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已转变为75:25，严重向学术期刊的订阅倾斜。

大学出版社面临危机

身处单纯的象牙塔世界，印刷版学术著作的经济性不在考虑之中。毕竟，创设大学出版社的专门目的在于发布学术成果，它们具备丰富的知识价值，却少有甚至是毫无经济价值。中国近110个发展势头良好的大学出版社，以及少数超大型大学出版社（如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则是例外。作为商业出版社，它们通过出版高盈利的学术期刊有效运营。除此之外，大多数大学出版社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大学出版社曾享有的补贴已被削弱或是彻底取消，处于这样一个全球高等教育环境之中，编委会在接收一份稿件前不得不考虑其销售潜力。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出版社，即它愿意无视惨淡的销售前景，接收作者有关匈牙利12世纪阿尔帕德王朝土地所有权的著作，这是何其幸运的事。

在很多学术领域，学术著作的出版依然是年轻学者们在学术仕途中晋级的衡量标准，由此产生的道德困境显而易见。学术圈会袖手旁观，让市场来决定一名学者的成败吗？一名人文领域的博士生应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吗：选择市场前景更被出版商看好而

非对人类知识做出贡献的论文主题吗？

开放存取的承诺

好消息则是，印刷版学术著作萧条的市场并不意味着长篇知识的终结。大量主要的学术出版社正采取措施改变学术书籍的经济模式，从纸质版转向数字化，从关注销量转移到开放存取。

例如，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Stockholm University Press）正积极出版具备学术严谨性的同行评审开放存取学术著作。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一经接受稿件就要求作者一次性支付图书出版费3250英镑，以涵盖图书印刷、发行和营销的全部费用。同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近期宣布出版作为其“透视举措”（Luminos initiative）一部分的前五本书籍。该系列图书是完全经过同行评审，被专业编辑过的学术图书，但采用开放存取电子书格式首发，喜欢纸质书的用户可通过按需印刷服务获得纸质版本。在学术书籍出版中采取类似开放存取模式的学术出版社还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ANU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 Open）、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SCO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欧洲网络开放存取出版（OAPEN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European Networks]）、柏林学术（Berlin Academic）等。

通过依靠这样的经济模式，出版成本在出版前期就有了保障，无需靠销量来弥补。因此，开放存取电子图书不仅能使学术著作幸免于湮没，也能为印刷版书籍带来益处：开放存取著作可以被完全或是部分用来作为

课程教材，学生无需为此付费。电子版本放松了对页数和插图数的限制，与此同时使得学者们可以自由运用诸如有时间线的增强地图、数据可视化和动态影像等数字时代的工具。开放存取也意味着聚焦于世界贫困地区的学术成果终于可以进入那些真正生活在该区域人们的阅读范围之内，因为这些欠发达地区的读者无法承担欧美纸质版学术书籍高昂的价格。

开放存取如何会失败

尽管开放存取的学术著作优点良多，但如果参与任用、升职、任期等决策工作的资深教授不认可的话，开放存取学术专著的成功就是奢望。在传统的以书本为中心的学术领域中，一些教授对电子出版物有着挥之不去的不信任感，除此之外，有些人认为出版成本由作者或作者所在机构承担跟作者自费出书没什么两样。对于那些有着这一固有想法的人而言，开放存取等新模式也被视为等同于剽窃或文凭造假的学术不端。

反对以自费出版抹黑开放存取的有力论据就是，合法的开放存取模式下，学术书籍的出版同样会经历与传统的纸质版书籍一样的、严格的同行评审和编辑过程。高品质的同行评审和编辑并非纸质书的专利。

另一针对自费出版的反击就是，除极少数例外，出版学术著作的费用通常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获得资助。在过去，一本纸质学术书的出版费用很可能是大学出版社利用学校的补贴来支付的。此种由受资助的学术出版社付费出版学术书籍的传统模式占据道德高地，而开放存取新兴模式下出版的书籍却被认为存在“道德污点”，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如果通过拒绝任用或奖励以开放

存取形式出版研究成果的年轻学者，学术保守主义的暴力扼杀了开放存取的学术书籍，那么，意料之外的后果可能就是学术书籍的消亡。当然，认为中止开放存取将拯救原有的印刷版书籍是相当愚蠢的。事实在于，学术出版社，包括非营利性的大学出版社，都

无法承担由于印刷大学图书馆无力购买的书籍而引起的长期资金亏损。开放存取为崩塌中的市场提供了一个选择。如果没有这一选择，书籍的出版最终会被中止，学术著作将成为与卷轴和泥金写本一样的历史遗迹。

论功行赏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10月6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头版标题题为“中国首次获得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相当引人注目。事实上,该奖项的获得者是中国中医药学院的屠呦呦博士,而非中国本身。同一天,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第四页上,大标题为“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治疗毁灭性寄生虫病的诺贝尔奖”,该文章几乎是顺便提及了三位获奖者的归属地,即美国、中国和日本。庆祝某国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的数量是一回事,毕竟在授予奖牌的时候国旗飘动、国歌奏响。但科学成就大不相同。现代科学不合理行为的另一方面就是许多科学杂志中合著者数量的激增。诺贝尔奖贡献和不合理的合著关系正好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科学贡献系统已失去控制。

诺贝尔奖委员会到底奖励什么?

诺贝尔奖授予个别显著的成就,并意指终生的科学工作。成就来自于研究者,有时或者是独立研究一个相似主题的几个同事或科学家。展开该研究所在的国家几乎与科研成就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研究者可能成长于一个地方,但却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这是常有的事。例如,诺贝尔医学奖的共同获奖者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博士在爱尔兰出生并获得学士学位,他之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在默克公司(Merck)工作期

间,他找到了寄生虫感染的治疗方法,这是他获得诺奖的工作部分。事实上,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特别是美国科学家们,大都是在别的国家出生并获得其整个教育生涯中的部分或所有学位。并且,许多人已经离开了他们进行开拓性工作的大学。

因此,诺贝尔奖是个人或者团队的工作。渐渐地,科学工作由一组研究者开展,他们常从属于一个专门的实验室。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还未意识到现代科学完全的合作性及国际性现状带来的影响,他们不把奖项授予团体,并且把可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的人数限制在三位以内。

贡献系统失控

如果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贡献分配上严格限制的话,学术科学可能会在另一方向失去控制。最近,在著名的《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有5154名作者。另一篇于2012年发表于该期刊上的文章有近3000名作者——直到文章发表时,其中的21位作者已经去世。

《物理评论快报》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阿德(Aad)博士,列于作者名单首位,他将获得巨大的引用量,这无疑会提升其声誉并增加他所属大学的引用率。该文章的主题是希格斯玻色子(the Higgs boson),有来自许多国家科学家的合作。尽管越来越多已发表的文章有1000或1000名以上的作者,

但这篇文章似乎创造了合著关系的世界纪录。

尽管科学真的是变得愈发具备合作性，但列出一长串作者名字的做法实在是毫无道理。这些作者都做出了实质上的贡献吗？正如将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列为第一作者一样，即便他或她并未对这篇文字做出任何贡献，这在一些实验室或是部门中仍是常态，这看上去至少是这成百上千名合著者中某些人获得了礼节性的挂名。将作者贡献提供给那些与实际文章的写作及准备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人，这实在是不太合适。

这一问题相当重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引用数常被用于大学排名和某些国家的政策制定，并常用于学术升职或加薪的个人评估之中。

这都意味着什么？

全球化、学术竞赛、不当的民族主义、对排名的沉迷、政府对问责制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科学开展方式的巨大变化均促成了我们当代的“成就问题”。尽管此处所举的例子似乎无关紧要，但他们实质上却是相当重要。科学生产力愈发成为一个国际现象，顶尖科

学家在一国受到教育，在另一个国家工作，并常常与世界各地的同仁们发展并分享研究。

因此，科学无国界，把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归功于一个国家和一所大学愈发无关紧要了。然而，每个地方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都在缩减——而基础研究正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奖项产生的地方。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和自主权的国家必然获得最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

同时，科学界自身在分配学术文章的作者贡献时必须做到合情合理。这些文章，尤其是那些发表在顶尖的经过评审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期刊上的文章，仍是科学的黄金标准，也是知识和传播的主要途径。尽管更大范围的群体为文章提供了观点和数据，但文章的作者数量应受到限制，只包括那些实际参与到文章书写过程中的学者。其他人可以在相关的致谢名单或参考文献中提及。

在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之中，我们处于科学认知与科研支持及评估的“学术革命”之中。从诺贝尔奖到拥有上千名作者的文章，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方法使一个日益失控的系统恢复理智。

高等教育研究走向全球

Hans de Wi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直到最近, 高等教育研究及其国际维度都只是少数研究中心和学者的阵地, 主要是在发达国家, 即便是在这些国家, 资金和资源也相当缺乏。现在有两项新的举措, 它们体现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更为积极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些举措可被视为2013年《上海宣言: 高等教育的未来——高等教育事业对科研和培训的需求》(*Shanghai Statement: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Need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Enterprise*)的产品。《上海宣言》反映了33位科研和政策制定专家关于高等教育科研、政策及培训领域未来发展的思考, 宣言指出: “这一正在发展的领域目前局限于较少部分国家之中。”该公告寻求世界范围内大学中更多科研活动及研究中心的建立, 呼吁国际高等教育在博士阶段的学习并寻求充足的资金。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ESRC/HEFCE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ESRC/HEFCE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CGHE) 于2016年2月至3月在伦敦正式建立。CGHE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中心, 专门关注高等教育及其未来发展。它获得了来自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600万英镑 (870万美元) 的资助, 用于其2016~2020年工作的开展。同时,

CGHE也是三所英国大学和几所世界其他地区大学的合作伙伴。

CGHE是一个合作组织, 由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领导, 与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及一些国际大学进行合作。国际大学包括: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日本广岛大学 (Hiroshima University)、荷兰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香港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及南非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GHE的核心关注点之一是在政策和时间工作上最大化其影响力。该中心由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 教授领导并拥有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重要学者, 如彼得·斯科特 (Peter Scott) 教授和艾伦·哈泽尔科恩 (Ellen Hazelkorn) 教授。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全球中心

同样, 2016年1月14日至15日,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全球中心 (Global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GCIHES) 团队的首次会议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召开。该团队的建立得益于智利天主教大学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中心 (the Centro de Estudios de Políticas y Prácticas en Educación, CEPPE) 与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一项举措。

该团队包括另外四名合作成员: 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高等经济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中国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南非德班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高等教育发展中心 (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以及意大利圣心天主教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 (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该团队由智利 CEPPE 协调。

GCIHES 团队的启动会议是在第十二届高等教育峰会 (the XII Higher Education Summit) 的背景下召开的, 该会议每年由 CEPPE 组织。GCIHES 团队决定聚焦于合作研究、职业发展以及知识传播。在该团队即将启动的项目中, 有一个世界范围内博士生教育的比较研究, 专门关注新兴及发展中国家; 对天主教大学的特性和国际化的研究; 计划 2017 年在上海开设的暑期学院; 将由德班高等教育发展中心主任丹都·特弗拉 (DamtewTeferra) 教授在 2016 年 8 月 19 至 20 日组织的“非洲、拉美及亚洲高等教育论坛” (Higher Education Forum o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GCIHES 的合作伙伴已进行双边合作, 例如,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合作开展了一项学术职

业研究。它们现将进一步开展合作研究及职业发展。该团队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个研究中心组成, 且以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居多, 这一事实打破了高等教育研究由欧洲和英语国家主导的局面。

该团队获得的经费来源不如 CGHE 那么丰富多样, 但它的建立是基于自己的资金和小数额资助, 例如来自纽约卡内基基金会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非洲、拉美及亚洲会议高等教育论坛 (the Higher Education Forum o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conference) 及卢克西奇天主教大学项目基金 (the Luksic fund for the Catholic universities project) 的援助。

GCIHES 中的三所天主教大学在圣地亚哥举办了后一个项目的首次研讨会, 展示了三所大学的案例研究, 内容是关于这些天主教大学是怎样将国际化作为其任务的一部分的。它们打算进行更多世界不同国家的案例分析, 并以此来推动这一研究。

国际高等教育的扩张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出版物——《国际高等教育》也在全球进行推广。除了该杂志的英文原版及由 GCIHES 团队中的三个合作伙伴翻译的中文、俄语及西班牙语版本外, 杂志也被译为葡萄牙语并将很快出现由 FTP 大学 (FTP University) 翻译的越南语版本。读者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得所有语言的杂志在线版本: <http://ejournals.bc.edu/ojs/index.php/ihe>。

两本衍生的、关注区域高等教育问题的杂志也已创办。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已经出版了《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Beyond)。2016 年, 另一份出版物——《新

加坡及其周边地区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Beyond*)将会问世,这是新加坡 HEAD 基金会与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合作开展的一项举措。

在此背景下,另一项新举措也有必要提及。2016年秋天,波士顿学院将启动时长为12个月的国际高等教育文学硕士项目,该举措由该学院领导,以提供结合了教育、科研和实地经验的卓越国际项目,采用混合学习方法,项目的教师和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也有来自我们的伙伴 GCIHES 的教职员。

《2013 上海宣言》

《2013 上海宣言》(*The Shanghai*

statement of 2013)是 CIHE 发起的圆桌讨论会议的结果。作为后续活动,该中心制作了一份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目录,并以“世界高等教育目录”(Worldwide Higher Education Inventory)为标题发布。该目录先作为交互式地图在 CIHE 网站上呈现。

两大高等教育研究全球网络的创立,即新的国际高等教育硕士学位及全球发展的《国际高等教育》杂志表明了全球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和传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过去,全球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研究正如其自身一样,范围狭小且主要关注国家和地区问题,现有的转变则是向国际高等教育进军。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国际化的国家政策——产生作用了吗？

Robin Matross Helms、Laura E. Rumbley

Robin Matross Helms: 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和参与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 研究副主任

电子邮箱: rhelms@acenet.edu

Laura E. Rumbley: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 rumbley@bc.edu

为应对日益国际化世界的需求和机会，各国政府正引入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和项目。这些举措得到了众多学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动机的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有时是个清晰的目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关注点则更多集中于具体活动或是广阔的国家政策目标之上。

近期由美国教育委员会和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仔细调查了此类政策的内容，对各类具体案例进行研究，我们近期报告《国际化全球高等教育：国家政策和项目》(*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就是建立在此调查之上。基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我们的分析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现有政策的五大类别。

类别一：学生流动。这类政策旨在鼓励并推动学生流动，它们是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制定的最常见关注点。各类国家资助的学生流动奖学金项目——从沙特阿拉伯到智利，从哈萨克斯坦到巴西，以及其他诸多国家——都是该政策关注点的主要体现。

类别二：学者流动和科研合作。该领域的政策活动在上许多国家以及重要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得以开展，欧盟在“地平线 2020” (the Horizon 2020) 举措下在此领域投入众多，如“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居

里”行动计划” (the Marie Skłodowska-Curie actions)。这一类别中常见的举措包括：对访问学者的支持、输送教师出国交流的项目和拨款、吸引居住在其他国家教师归国的政策、以项目为基础的研究补助金。

类别三：跨国教育。无论是分校还是其他形式的实体“基地”，或是虚拟（或混合的）形式（如慕课），这一领域的国家政策和项目活动包括：促进能力建设的合作伙伴关系、创建教育“中心”、鼓励国内院校在海外建立校园和开展项目、在实践中更有效地规范跨国教育。

类别四：本土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IaH)。本土国际化出现不久但却是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兴关注点。一些政策文件现在公开谈论这一趋势。欧洲委员会 2013 年国际化战略《世界中的欧洲高等教育》(*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则是例外。但本土国际化肯定是观察未来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

类别五：“综合国际化”政策。我们观察到少数举措提出了相当广泛的一套原理、行动方针、关注领域和/或地理方位，而非专注于具体的行动方针之上。欧洲委员会的国际化政策愿景又一次引人注目，同样的还有加拿大 2014 年《国际教育战略》(*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和马来西亚 2011 年《马

来 西 亚 高 等 教 育 国 际 化 政 策 》
(*Internationalization Policy for Higher Education Malaysia*) 等。

衡量有效性

国家层面的国际化政策与项目在各类环境中大量增加,有效性的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这些政策对其高等教育系统的国际化方向和进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吗?长远看来,它们在推动其设定的学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或文化目标上取得成功了吗?

确定国际化政策的有效性具备挑战性,这在与教育有关的问题上情况常常如此。此类工作通常集中于便于测量的、清晰量化的成果。比如说, A 国的政策是否实现了在特定时间内为本国大学招收 X 名国际新生的目标?除参与者数量外,财务分析是另一个便于量化的数量,它常吸引着决策者的关注,所以也能作为评价工具发挥作用。

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欧洲委员会以及国际大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就此类政策更为模糊、长期的结果和影响进行了研究,采用各种方法,在描述不同政策的影响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总体而言,有关政策影响这一问题的特定数据和清晰答案都相当缺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许多国际化政策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新特性——现在就指出其最终影响还为时尚早。在许多其他情况下,评估政策影响还未列入政策执行结构之中。

研究分析了有关有效性的大量政策及可用数据,然而,很明显的是,有诸多的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这些因素既是政策本身所固有的,也是影响实施的外部因素。

资金最为重要。不足为奇的是,政策有效性可能会直接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如政策在何种层面上得到资助、资金分配的方式、一段时间内资金得以维持的程度。

政策如何实施、由谁实施都是相当重要的。众所周知,“万全之策”并非思考国际化政策与实践的有用途径。所以,国家政策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得以实施:例如,涉及许多行动者或仅仅几个人。政策的实施方式会对诸如有效性等问题产生主要影响,并引发有关政策实施者在推动其议程和管理工作上能力的重要问题。

探究单个国家政策本身外的内容引出了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和调整问题。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国家政策环境复杂且相互关联。某一领域开展的举措会对其他政策领域开展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与国际化有关的经典例子包括吸引国际学生和学者的国家目标与控制进入某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间的交叉领域。如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相互脱离或是相互矛盾,那么,政策有效性将受到损害。

最后,政策目标与院校重点的趋同度影响了国家举措的有效性。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由高等教育机构自身最为直接体验到的现象。为此,国际化的国家政策必须立足于对院校实际情况的理解之上。国家政策未能将院校重点考虑在内,或是院校重点不考虑国家政策,都会为取得成功结果带来挑战。

国际化的国际化

各国的国际化政策最终将实现其短期和长期目标吗?只有时间才能给予我们答案。但更有趣的问题可能是此类政策将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什么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致力于以非常具体、正式且资源密集的方式来国际化其高等教育系统,它们认为这是合力开展下一阶段工作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国际

化的国际化”的合适时机。当我们发现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即我们的政策相互支持并相互巩固，国家层面的政策带来的影响将会实现最大化。

这并非易事——它需要对现有政策的广泛认识，也需要国家决策和院校层面的对话。正如我们在美国教育委员会—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报告结尾指出的那样，“要确保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获利于全面、持续、以价值为导向的国际化需要丰富的创造力、大量的资源以及努力的工作”。

注：本文基于作者的报告——《国际化全球高等教育：国家政策和项目》（*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grams*），该报告由美国教育委员会在2015年10月发表，可参见 <https://www.acenet.edu/news-room/Pages/CIG-E-Insights.aspx>。

就业机会是学生流动的一大助力

Christine Farrugia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学术流动研究及影响中心 (the IIE Center for Academic Mobility Research and Impact)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cfarrugia@iie.org

作为世界范围内学生流动的一大推动力,获取实际工作经验的机会变得愈发重要。过去几年中,《门户开放调查报告》(Open Doors®)记录了在海外工作、实习和进行志愿者活动的美国学生数量激增的状况。2013~2014年,超过4.1万名学生参与海外流动,其中既包括那些通过海外工作获得学分的学生,也包括那些寻求无学分海外工作机会的学生。国际学生也很重视工作经验,以补充其学习,2014~2015年,美国近100万国际学生中超过12%的学生参与了“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简称OPT),它是指从美国院校毕业的国际学生可以参与一段时间的工作。近期,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毕业生“选择性实习训练”资格周期有所延长,尽管参与以上项目的学生占据了上述比例的一部分,但愿意继续工作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意味着对许多学生而言,海外工作经历是国际教育中相当重要的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管理学生工作能力的政策已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国际学生数量,包括加拿大、德国、新西兰和英国。

一些国际学生认为工作更具吸引力

对于某些国家的学生而言,工作机会是促使其参与海外流动更为重要的驱动力;而对于另一些国家的学生则并非如此。许多学

生重视获得实际工作经验的能力,这会帮助他们在返回祖国或是在留学国获得工作机会;另一些人或许是受到了其祖国经济状况的驱使,促使他们合理利用留学国提供的与学业相关的工作机会。

许多亚洲学生在寻求“选择性实习训练”方面相对活跃,包括来自印度、尼泊尔、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学生。对于毕业后在留学国的工作机会,印度学生特别积极。在美国,印度学生参与“选择性实习训练”的人数最多,22%的印度学生在2014~2015年间参与了“选择性实习训练”。同时,在英国,由于政策变化,对于毕业后的工作签证限制加强,印度学生数量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减少。在英国政策实施后,印度学生数量从2011~2014年减少了近一半,但在同一时期,印度学生数量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增加了70%和37%。

尽管许多学生渴望得到既能参加海外学习又能获得实际工作经验的机会,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通过毕业后的工作实现这一点的。巴西的学生就是一个例证。2014~2015年,在美国,不到5%的巴西学生参与了“选择性实习训练”,而超过1.2万名学生在2011~2015年间在学习期间参与了实习项目。这些培训机会已被纳入巴西政府的“科学流动项目”

(Scientific Mobility Program) 之中, 作为学生学术和职业准备的关键组成部分, 以确保学生在返回祖国时拥有学术知识和实践技能。对一些国家的学生而言, 工作机会在其流动模式中影响不大。例如, 2014~2015 年在美国参与“选择性实习训练”的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学生数量仅占 2%。然而, 较低的“选择性实习训练”参与比例并不意味着学生对于工作机会的兴趣不足, 更多的是由于其政府奖学金项目的情况, 这些项目鼓励学生一毕业就马上返回祖国。

学生从何而来不足以构成他们寻求与其学业相关工作机会的可能性; 学生本身的特点也很重要。作为“促进海外学习”(Generation Study Abroad) 项目的一部分, 由国际教育协会开展的一项有关美国学生非学分海外教育的专门研究(即将开展)发现, 较之于参与传统的基于课程的海外学习项目, 更多男性选择参与非学分活动, 包括工作、实习和志愿活动。在各学生所属院校的报告中, 40% 的学生是男性, 与之相比的是, 根据《门户开放调查报告》的记录, 在传统的可获学分的海外学习项目中, 男性比例为 35%。尽管在两种形式的海外教育中, 男性参与比例仍然较低, 但参与非学分教育项目较高比例的男性人数似乎与一些轶事报道相一致, 即在男性学生认为国际经验能为其带来实际的职业价值时, 他们才更倾向于出国。

国际合作课程所提供工作经历的价值

在美国国内, 人们普遍认为实习和工作经历是高等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学生获得课堂之外工作经验和实践技能的重要途径。事实上, 一些学术项目要求学生完成作为其学业一部分的实习项目并为学生做好毕业后的工作准备。对国际学生而言, 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会为其提供类似的教育利益, 并为他们在各自的学习领域提供关键技能, 最终帮助学生们以良好的状态进入其留学国、所属国或是另一些国家的工作市场。当国际学生待在留学国时, 他们为该国的发展贡献技能和知识。即便国际学生最终在另一个国家工作, 他们也会增强科研和商业上的国际跨国联系。

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其学习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寻求实习和工作经历。通过反映学生在毕业后将如何利用其国际技能, 全球实习是使海外教育更具意义的方式之一。虽然在佛罗伦萨学习艺术相当不错, 但对某个学生而言, 作为团队的一部分在洪都拉斯修建油井或是为中国某个公司市场战略的发展做出贡献可能会更好。此类国际经历提供了跨文化“软”技能以及变革性的个人体验, 这对许多留学国外的人而言并不陌生, 同时它也为学生提供获得工作环境中实用的“硬”技能的机会, 这些技能可以毫不费力地完全转化到工作市场之中。

国际教育市场：一些新兴趋势

Neil Kemp

英联邦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国际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neil.kemp@nkeducation.com

近期大部分留学目的国的数据显示，国际学生流动持续增加。这一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变化，下面将就选取的趋势进行简要讨论。英国是招生数量增长中的主要例外，因为英国严格的移民规定对国际学生数量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问题

十年后会有多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上无数大学过度依赖招收中国学生。2012年，在海外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估计超过70万人，是第二大留学生输出国印度的三倍多。尽管中国大学不断的扩招可能会减少学生的对外流动，但鉴于适龄的接受高等教育中国年轻人的数量将显著下降，人口变化可能将是主要因素。然而，对于多数留学目的国而言，现在中国留学生的招生数量持续上升：澳大利亚和德国均上升了8%，美国上升了11%。

2013年，在英国的中国学生数量上升了约5%，1.73万名新进中国本科生中超过一半的人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转学安排来到英国的——学生在中国完成初始阶段的学习后，在英国大学开始第二或第三年的学习。此外，许多这些经由转学项目而来的本科生会进入硕士项目的学习。

印度流动仍在继续

印度学生的招生数量近期在美国上升了

30%，在澳大利亚和德国分别上升了20%和21%。与之相反的是，在英国，这一数字下降了超过12%——据估计，印度学生人数的减少很可能在2013年对英国经济造成了7000万美元的损失。

年轻印度学生对于留学目的地的选择与移民政策和毕业后获得工作的机会紧密相关。这并非意味着年轻的印度学生寻求的是长期移民；他们仅仅是想通过工作经历巩固其学业。例如，在美国，约3.2万名印度学生在是一所美国大学注册，他们都参与了临时就业项目。

印度学生对出国留学的需求似乎仍在上涨，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这受到了高中毕业人数快速上升的驱使——印度总的高等教育招生数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000万人，比2014年增加约32%。

一些其他流动趋势

美国大学中沙特学生的招生数量持续快速增加（过去三年上升了45%，达到6万人），但这一数字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却呈现下降趋势。在巴西，“科学无国界”（Science without Borders）项目现面临缩减，许多沙特及其他中东国家学生通过其政府奖学金获得资助，而非个人资金。依赖国家奖学金项目风险很高，特别是对那些拥有诸多此类学生的大学而言；政府可以很快启动奖学金项目，它也能随时中止这些项目。

针对其他一些拥有大量（现有及潜在）流动学生的国家，可以发现到以下情况：

- 韩国的对外流动学生数量处于波动之中（超过 11 万名学生在国外学习），据报道，在美国（现约 6.4 万人）、日本（1.6 万人）和澳大利亚（约 6 000 人）的学生数量有所下降，但在英国（近 4 500 人）的学生数量上升了；

- 尼日利亚学生的对外流动持续增加，英国是主要目的地（超过 1.9 万人）、加纳（1.2 万人）、美国（近 1 万人），其他人则是在马来西亚（2 700 人）、加拿大（2 500 人）及南非（2 300 人）学习。同时，据报道 2012 年有 3 600 名尼日利亚学生在乌克兰学习；

- 出国留学的越南（5.4 万人）、伊朗（5 万人）和马来西亚（约 6 万人）学生数量都有所增加；

- 俄罗斯出国留学人数上升（超过万人），首选目的国为德国（1.45 万人），其次是美国（5 600 人）；

- 考虑到国家规模，印度尼西亚似乎潜力巨大；然而，尽管印尼经济形势良好，大学入读率也在增加，但其国际流动仍处于中间水平（约 4 万人）。

英国大学国际招生中近期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从大规模招收南亚学生就读一年制硕士学位项目（过去三年下降了 42%）转移到了从中国、新加坡、香港及马来西亚招收本科生（上升了 24%）。从一些欧洲国家招收本科生到英国就读近来也呈现下降趋势（包括德国和法国）——这是对英国高等教育学费、人口变化或是英国政府对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些许负面讯息的回应吗？

低/中等收入国家竞争力的提高会导致对外流动的减少吗？

并无证据显示以上所说的这些会发生，反之亦然；需求的本质持续演变，带来了学习主体、层次和模式的更加多样化。多年来，这样的模式在富裕国家更加明显，其对外流动持续增加——例如，美国学生是英国国际学生群体中的第二大组成部分，且其目的不限于海外留学。同样，英国在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和挪威学生的招生上稳步增加。

另外的例子也包括美国。在美国的欧洲学生数量也稳步增加。在马来西亚，尽管政策变化带来了当地大学的扩招，但在英国和美国学习的马来西亚学生数量持续上升。

成本上升，竞争加剧

吸引国际学生的竞争加剧，大学需要投入更多以支持招生，这导致了成本的上升。在澳大利亚，每期新的招生成本超过 4 000 美元，在英国这一数字约为 3 000 至 5 000 美元。这些花费包括国际人员支持、市场营销投入、代理佣金以及少数大学的海外代表处运营经费。

通过与大学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私立教育公司也为支持国际招生提供服务，包括提供预科和语言项目；顶尖的教育公司包括美国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澳大利亚纳维达斯教育集团有限公司（Navitas Ltd）和英国 INTO 教育集团（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合作和衔接协议

跨国教育（transnational education）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更强的国际流动，许多跨国项目旨在鼓励学生在某一阶段转学到授予学

位大学的主校（协议包括衔接、双学位和/或对之前学习的认可）。参与项目学生和学习的动机是出于教育和财务等多方面的，国际学习的时限从几个星期到两至三年不等。除了招募中国学生到英国（上述）的转学项目外，也有许多其他的协议。例如，在印度，一些美国和英国大学提供有转校协议的学位项目；通常，美国大学提供的硕士项目可能会有一年在印度学习，第二年在美国，而多数英国项目都是在本科阶段。在马来西亚，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马来西亚双威大学（Sunway University）与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就有转学协议。

新的、灵活的交付和支持协议也适用于博士项目，包括分站博士（split site PhDs）、转校协议、居住项目以及更多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监督支持。例如，2013年，超过4 600

名学生在自己的国家参与了英国的博士项目。

结语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国际学生流动在未来十年都可能会持续发展，每年以5%或更多的比例增长。尽管留学需求由中国和印度引导，但其他国家的对外流动也显著增加。强劲增长趋势带来的机会使得更多国家和院校希望招收国际学生。尽管这为学生带来了更多的学习选择，但竞争也引起了招生成本的上涨。许多国家及其院校对于国际学生不断增加的依赖、市场演进的速度和变化以及激烈的竞争都表明了：人们需要更多理解，即需要更好的市场调研和情报，以及需要更多思考为何国际学生会选择特定的留学目的地，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行政人员对国际化的价值

Uwe Brandenburg

德国高等教育咨询中心 (CHE Consult) 执行合伙人

电子邮箱: Uwe.brandenburg@che-consult.de

国际化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学生和学者。但你可以想想:谁是国际学生在留学国的首个联系人?此人通常不是教授可能甚至也不是国际办公室员工,而是核心行政人员和服务人员,比如说宿舍的门卫或是管理员。对留学生而言,与之讨论留学规划的不是教授,而是行政人员。然而,多数战略和分析都忽视了行政人员作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行政人员在此定义为不参与学术科学工作的人员)。这一趋势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伊拉斯谟影响研究”(the Erasmus Impact Study),它明确地研究了行政人员在流动和国际化中的角色。行政人员在政治层面也获得了关注:博洛尼亚后续工作组(the Bologna Follow Up Working Group)在其报告中强调,在未来的流动项目中,需要开展针对行政人员的相关工作。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测量针对这一目标群体国际化活动的有效性将变得举足轻重。

一个名为 InHoPe 的大型研究始于 2014 年并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资助。在该研究中,我们力争解决这个问题且力求分析非学术人员的国际性水平及其在德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对国际化活动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国际化的有效管理提供建议,侧重点在于员工的招聘、结构和发展。

从前两轮的数据收集和初步分析表明,行政人员这一群体构成了一所高校重要的信

息来源及文化基础,因为他们留任于一所院校的时间丝毫不少于学术人员。超过 40% 的受访者在学校工作了 20 多年,四分之三的人是终身雇员。结果也表明,过去几十年中,行政人员在高校中的日常工作日益变得国际化: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每月都与国际学者或学生联系。然而,似乎大多数员工仍缺乏此类经历: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国外单次停留超过三个月。因此,比起人员发展和筛选过程,工作环境似乎发展得更快。

使行政人员更加关注国际化潜力巨大

在高校中,大部分行政人员不仅在参加工作前没有国际化经历,而且他们在之后的工作中也很少有机会在这方面有所弥补。89% 的行政人员从未参与过人员交换,87% 的行政人员从未得益于跨文化培训,60% 的人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时参加过语言课程。但就此推测行政人员对于此类活动不敢兴趣则是不对的:三分之二的人热衷于参与跨文化培训或是人员流动,五分之四的人很乐意参加语言课程。当然,不参与这些活动也是有原因的,特别是缺少时间以及缺乏对这些活动为今后工作带来直接效益的清晰认识。行政人员通常缺少关于如何参与国际化活动的信息,特别是人员流动和跨文化培训。研究也显示此类活动并非华而不实,它们其实有着巨大影响。

行政人员国际化所产生影响的初步认识

我们从概念上推断参与国际化活动的经历在以下三个方面上对非学术人员的国际性产生影响：人格特征、态度和能力，以及工作环境。首先，我们认为那些与工作中典型的国际和跨文化经历相关的人格特征会发生改变。其次，我们认为参与国际化活动会影响个人态度，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程度产生影响。再次，我们旨在揭示在何种环境下，以上两方面（特征和态度）的影响改变了非学术人员与工作相关的实践。

我们的三方面模型（人格特征、态度和能力、工作环境）似乎是有效的。我们发现了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并且，数据似乎证实了人格特征最终有力决定了其他两方面的结果。

通过招聘和员工发展使行政人员国际化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推断：一般而言，比起通过国际化活动（如流动或跨文化培训）培养人员能力，招聘工作前就有国际经历的人员对国际性有更大影响。尽管人员发展对于较低职位人员以及处于较高职位却不常关注国际化的人员而言尤为有效，但是招聘具有国际化经历的人员更适用于增加高级职位以及国际办公室人员的国际性水平。在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中，人员招聘在制定框架上都举足轻重。人们需要采用正确的标准以寻找合适的人选。另外，国际化活动对于思维模式有着很强的影响，但它们并非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效果。这些活动似乎对那些没有国际化经历且处于较低职位的人员尤

为有效。其实，招聘和国际化活动这两种途径都有必要且高度互补。

从实际执行中能够获得什么经验？

我们要改善招聘国际化非学术人员的针对性手段和程序。

就人员发展而言，首先，更多的人想参与国际化活动但却缺乏如何参与的信息：因此，提供更多信息相当重要。其次，许多受访者称他们没有时间。国际化并非“高于一切”。它必须融入人员发展战略和日常工作生活之中，比如：在高管和员工每年的反馈会议中置入流动窗口，或是就纳入准备培训和课程的常规时间段，以及在员工合同中规定与流动相关的内容。行政人员的国际化活动（如语言和跨文化课程、参与流动项目、工作人员周 [staff week]）必须与人员发展差异化和系统化的框架紧密结合。高校应将其项目立足于有关偏好、先验知识以及行政人员经历的信息之上。诸如流动项目等活动应明确针对作为特殊群体的非学术人员。我们要允许并支持与技能发展活动相关的员工自下而上的举措。

这需要更为连贯的人力资源结构，如行政人员国际化活动系统性的后续行动，以激励高校中的组织学习，以及把不同的国际化活动融入结构化项目之中。德国德累斯顿科技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的“冲刺项目”（the SprInt program）就是一个良好示例，该项目的证书包含语言课程、跨文化课程以及可选择的流动项目。

就今天的国际化而言，非学术人员是一个关键群体，凭借定向招募的正确措施以及精心策划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他们的表现可以得到极大提升。

巴西科学无国界的兴衰

Creso M. Sá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所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高等教育教授、加拿大和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c.sa@utoronto.ca

自2011年发起之时,巴西的“科学无国界项目”(Science Without Borders program)就吸引了大量关注,项目承诺为10.1万名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生提供出国留学机会的支持。由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带头并有12亿美元的初始预算,该项目似乎代表了一个大胆的投资。巴西长期缺乏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毕业生,且其高等教育系统极其封闭。因其明确关注把学生送入排名靠前的大学,一些人认为该项目是推动国际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该项目运行至今还不到五年,前景难料。巴西雷亚尔相对美元贬值,国家预算紧缩,这些使得2015年秋季项目资金的暂停。一些授予的奖项被取消,项目仅支持那些已经出国的学生。以其现有的形式,科学无国界项目很有可能难以为继。然而,现在的预算情况并不是影响项目的唯一问题,它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可疑的政策设计

科学无国界项目作为一项总统倡议而设立。项目重点及其设计并没有咨询过程和公共协商。尽管联邦机构在管理研究生境内和境外学习的学术项目中长期发挥作用,但该项目以与现存举措完全不同的规模和形式活跃起来。该项目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它对本科生的关注。科学无国界近79%的奖项

是“三明治”奖学金,支持本科生一年的海外学习。这为联邦机构管理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带来了全新的关注点。

这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具备实际需求性:人们很快发现本科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低。联邦机构不得不竞相为另一些有资格的学生安排语言培训,这已合理化为“推动获得”海外学习机会的举措(参见<http://isf.mec.gov.br>)。显然,在项目开展前并没有对候选人进行严格分析,因而导致增加了提供语言学习支持所做的临时工作。

另一个需求问题来自私有领域。企业有望提供2.6万项奖学金以达到总目标,但却从未实现。潜在赞助企业和联邦机构对目标的反对意见导致许多公司撤回其支持。

从根本上说,本科“三明治奖学金”(sandwich scholarship)缺乏学生所属院校与学术项目的真正衔接。由此引发了一些问题:学生被招入了不是其所学领域的院系,学生要学习与其专业无关的课程,他们在外国大学学习的课程并未得到原属院校的承认因而不能获得相应学分等。

学生体验

科学无国界项目为管理机构带来了可怕的管理挑战。这些机构还未做好准备以应对科学无国界带来的大量申请和受资助人,这使得他们无法为学生提供个人协助并对学生

的个人材料进行适当的监管。同时，及时支付学生津贴和搬迁补助、缴纳学费等反复出现的问题都给一些受资助者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多伦多大学的胡列塔·格里科（Julietta Grieco）开展了一项研究以详细调查本科生的学习体验，该校是科学无国界项目受资助者最多的高校。总体而言，学生在巴西缺乏适当的行前准备，以为其进入新的学术和文化环境做好铺垫。他们也缺乏有效的海外学术咨询，以帮助他们在留学国获得机会并在学术系统中提供指导。

学术项目结构的差异使学生们参与课程的水平与其实际情况不符，这是由于缺乏课程运行方面的知识或是学生们缺乏更高层次的课程教学要求。对某些学生而言，主要的限制在于，他们无法在留学国获得那些提供其所学专业项目的学院或是部门的录取资格。这往往是以下学生面临的困境：他们在巴西学习专业本科课程，但该课程仅在北美地区的研究生阶段开展（如，医学）。此类学生被分流到一般的文科课程之中，上课内容与其在原所属院校的学习项目毫无关系。

科学无国界项目允许学生参与企业或科研实习。然而，项目的这个方面并没有综合协调，对学生也没有清晰的指导，就如何进入可能为其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司或是学术实验室，学生们得到的是不均衡的协助。尽管一些学生在课程和实习中获得了积极的体验，但这些积极成果很大程度上都是凭借运气。

缺乏政策学习

在科学无国界项目中，缺乏政策评估的国家文化相当明显。政策失败、浪费性支出以及负面意外结果的风险对于这一规模的项目显而易见。不幸的是，还没有任何机制来监测和评估该项目，并产生有益的政策教训。

就巴西政府在设计 and 实施有效公共政策中缺乏政策能力这一问题，科学无国界项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关键项目特点晦涩模糊、缺乏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协商、自上而下的实施方案，都导致了项目设计的不完善。上述设计中的主要缺陷都是可避免的。然而，人们并未对评估学生、管理机构、大学以及潜在的企业合作伙伴现有的需求做出努力。

建立优先选择

科学无国界项目消耗了大量本可以在别处更好利用的资源。有关把64亿巴西雷亚尔分配到该项目的相对价值的讨论从未出现。这是基于该学术研究体系的一个必然决定。科学无国界项目的资金并非“新进资金”，而是支持大学研究者和研究生资源的再分配。这导致了支出预算的缩减和延迟，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科研项目。这些影响应当被视为该项目机会成本的一部分。

该项目以其原始形式重现生机似乎不太可能。项目对本科生的关注很难具备学术合理性，还出现了反对党中的政治对手。鉴于项目与总统有所关联，政府不可能简单终止该项目以示项目失败。比较有可能的做法是通过预算过程，低调地缩小规模并将关注点转移到研究生培训之中。

高风险的入学考试：巴西视角

Simon Schwartzman、Marcelo Knobel

Simon Schwartzman: 巴西工作与社会研究所 (the Instituto de Estudos do Trabalho e Sociedade)
资深研究员

电子邮箱: simon@iets.org.br

Marcelo Knobel: 巴西国家纳米技术实验室 (the Brazilian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Laboratory, LNNano) 主任、坎皮纳斯大学 (University of Campinas, Unicamp) 格列布·沃太辛物理研究所 (the Gleb Wataghin Physics Institute) 教授

电子邮箱: knobel@ifi.unicamp.br

在巴西, 高中毕业统考作为大规模的、统一大学入学考试, 其主导地位日益增强, 这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除有效规划高中课程外, 统考明显不利于那些不准备读大学的学生, 它限制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多样性和区域特征。其他采用全国入学统考的国家也遭受非议。本文给出了一些可能做出改变的建

议。在全世界, 成百万的学生及其家庭面临着高等教育入学的紧张过程。一些国家采用全国统考以决定学生的录取, 该系统常被视为是民主且基于择优录取原则的, 因为所有学生都参加同样的考试。在巴西, 中学的全国统考 (Exame Nacional do Ensino Medio) 与中国的高考 (或是大学入学考试) 以及土耳其、智利、俄罗斯等国类似的高风险入学考试差不多。当前有关全国统考的公众言论凸显了其缺点, 且与在其他地方出现的类似讨论并行。

巴西高等教育的特点是规模小, 由少数精挑细选的联邦 (国立) 大学组成了资金相当雄厚的网络, 招收了 110 万名学生并提供免费大学教育; 还有大型的私立教育领域, 招收 540 万名学生。此外, 60 万名学生就读

于区域性州立大学, 这些大学也提供免费教育。与许多其他拉美国家不同的是, 公立大学的招生名额有限; 学生 (在过去) 在参加每个院校自行设计的入学考试基础上争夺入学名额。私立院校通常为那些没能顺利入读公立院校的学生提供收费低廉的夜校课程。除开少数精英型私立院校, 入读这些私立学校的唯一限制条件就是学生的支付能力, 他们无需参加全国统考。

中学国家统考

作为一项中学阶段的自愿考试, 全国统考始于 1998 年, 旨在评测毕业生质量。2010 年, 教育部与联邦大学同意将全国统考变为其招生的主要选择策略。现有的考试版本是以课程内容为基础的葡萄牙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写作测试, 考试每年举行一次, 为期两天以上并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通过考试的学生可以申请全国任意范围内的两所联邦院校。考试结果也被用于选拔获得助学金或是助学贷款进入私立院校进行学习的低收入家庭学生; 用于决定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资格; 也作为提供满足某项最低标准的成年人中等学校结业证书的依据。

全国统考因其高昂的成本、易于腐败的特性以及考题的质量和认知偏差（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而饱受争议。它花费了政府约一亿美元，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或是公立院校的学生无需缴纳15美元的考试报名费。一直以来，为防考题遭到泄露或被人盗取，需要采取安保措施以限制使用移动设备接收和/或共享考题的正确答案。此外，人们愈发担心全国统考对中等和高等教育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2015年，950万现有及过去的毕业生参加了考试。他们中的280万人竞争联邦院校的20.5万个入学名额。数据显示家庭教育背景良好的学生以及来自高质量的私立院校或精英型公立院校的学生更容易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这些学生提高了考试的总体得分，致使当地学生更难进入联邦院校。

全国统考的负面影响

巴西中等教育的课程包含15门以上的必修科目，没有选修课程，也没有职业教育的灵活性和空间（仅在完成传统课程后才能进行）。全国统考强化了这一僵化的标准，把所有的中学直接转变为了应试教育机构，即便大多数参加考试的学生不会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且大部分学生会进入很少需要资格考试的私立院校学习。

尽管高等教育机构在规模和质量上差异巨大，从研究型公立大学到小型的、关注职业教育的私立夜校，它们除教学资格不同外，都提供同一类型的学位。国家法规允许短期职业学位，比起资质较差大学的学位，这些学位可以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但这一系统缺乏获取高等职业教育的途径，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占整个高等教育招生的比例不足14%。将全国统考转化为不同类型的测

试，可能会促成高等教育的分化。

全国统考也已削弱了联邦大学与其当地社区间的联系。在全国各地建立这些院校旨在为当地人口提供教育机会并通过拓展工作和应用研究促进区域发展。因为全国统考将允许任何区域的学生申请国内各地的联邦大学入学名额，所以，它有望促使高等教育的准入机制变得更加民主。然而，缺乏对学生的资金支持，重新安置学习地点的方法受限，使其变得遥不可及。另外，对全国统考的普遍接受事实上使得这一系统更加精英化了。处于偏远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接收那些来自富裕地区、可以偿付迁移费用的学生充实了一些学位项目，却借由提高入学基本分数把当地的申请者拒之门外。

对中国、土耳其和智利全国统考的批判

其他国家同样也在质疑其统一的国家考试。在中国，改变高考系统是其未来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改变提议把数百所大学从学术院校变为更加符合工作市场需求的职业院校。中国政府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批判了高考系统，因为：（1）“一考定终身”；（2）录取和选取标准过度依赖于高考分数而非综合的选取标准；（3）对于所有不同类型和水平的高等教育机构只有一套考题；（4）考试内容和风格不符合素质（更灵活且更有创造性）教育的目的；（5）入学计划的不平等性在各省份中存在；（6）高等教育机构在招生过程中缺乏自主性。

对土耳其大学入学（Turkish ÖSS）考试的批判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此外，也谴责了通过家教临时抱佛脚的依赖；高度的社会选择性；考试在阻止学生就读职业院校上的影响。

在智利，进入主要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也是由国家考试，即“大学选拔考试”(University Selection Test)所决定的。对该考试的批评大都与其加重了社会歧视有关。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09年的一篇关于智利高等教育的文章写道，“大学选拔考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经济群体间大学名额的分配不公”。较之于私立学校或是富裕家庭的学生，市属学校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太可能通过大学选拔考试。如果通过了考试，他们也少有可能取得高分以获得学生资助并进入最好的大学学习。

改革建议

在巴西，关于全国统考的争论与中等教育改革的争论相关。建议从统一的课程转化为多样化课程——课程核心主要关注语言和

数学，选修课包括高阶学术学习或职业选择，后者是针对那些一毕业就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中学必须提供通识和专业教育，而不是提供以入读公立大学(仅有少数人可以就读)为导向的应试课程。全国统考应考察综合的语言和数学能力，并包括单独评估，针对的是学生选择的不同路径，包括技术职业证书。结合其他适用于院校学术和区域性使命及目的的标准，这些考试的结果可被高等教育机构用来挑选学生，

最后，显而易见的是，每年实施国家统考的现有举措实在是相当愚蠢。考试应该在不同时间和区域进行，采用全球其他地方使用的现代技术和设备。国家考试并不是高等教育不平等入学机会的原因，但是，维持这样一个加剧这些不平等的体系是毫无道理的。

突尼斯大学中伊斯兰教徒与不信教者的分裂

Amanda tho Seeth

德国马尔堡大学 (University of Marburg) 政治学院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Amanda.tho.Seeth@gmx.de

2011年1月,班阿里(Ben Ali)政权被推翻。五年后,突尼斯仍深陷在不信教者与伊斯兰教徒的身份挣扎中。民主时期,对极度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需求进入了政治和公共话语之中,并对突尼斯传统的不信教形象带来了挑战。伊斯兰教徒与不信教者间的裂缝经由大学不断扩大,在数十年的宗教管制与去政治化后,它已转化为政治仇恨和激进主义的乐园。

伊斯兰教徒主导大学理事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系统高度的公共投资,通过法语作为教学和工作语言带来的强有力的国际连接,加之自2006年以来加入博洛尼亚进程,这些已促进了阿拉伯地区突尼斯大学的卓著名声。此外,独裁主义的崩塌为突尼斯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大学警方在此之前无处不在,此后,他们被立即移出大学校园,临时政府很快启动了对高等教育法主要的司法改革。新的变化是民主的学术参议会,每三年进行一次院长和主任的选举。此外,还有民主的大学理事会来进行大学校长的选举。突尼斯的大学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前沿,但由于民主化,这些大学变成了伊斯兰教徒和不信教力量的斗争场所,特别是在学生中。

突尼斯学生大体被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极左的“突尼斯学生总会”(Union Générale des Étudiants de Tunisie,简称UGET),另一

个是其反对者“突尼斯学生总工会”UGTE (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es Étudiants,简称UGTE),后者是一个松散的隶属于伊斯兰安纳达党(the Islamist Ennahda party)的伊斯兰教学生组织。UGTE和安纳达党在民主化前都被禁止,但现在它们已成为了最有力的政治行动者并塑造着大学生活的未来。在2015年11月的大学理事会年度选举中,UGTE有史以来第一次击败了UGET。伊斯兰教徒占据了528个席位中的224个(42%),而曾主导理事会的UGET所占席位又回落到了110个,还有114个席位仍然空缺。

每个大学理事会都由大学校长、部门领导及学生代表组成,掌管大学的内部事务,如学生项目、人力资源规划或外部合作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代表将在校园中占据多大的主导地位,从而引发课程的变化、带来有关性别隔离和衣着合理更为严苛的规则、或是与诸如海湾国家等更加保守的国际高等教育提供者更紧密的合作,这些都将是拭目以待。

由于大学理事会的权力分布常被认为是广泛的社会政治取向的反映,媒体对UGTE胜利的讨论体现了议会中对安纳达党的重新支持。安纳达党在2011~2014年间领导国家临时政府,但在2014年的议会选举后,它成为了仅次于世俗的突尼斯呼声党(the Nidaa Tounes party)的第二大势力。在2015年2月组成的现有内阁中,安纳达党力量微弱,

仅掌管着就业与职业培训部 (the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的大权。然而, 自 2015 年 11 月, 呼声党的 31 位成员在经历了党内斗争后离开了该党, 安纳达党又再次占据了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执政世俗党派力量的削弱以及大学理事会中伊斯兰教徒的胜利同步发生, 这带来了未来数年伊斯兰势力在政治和学界的崛起和稳定。

校园中的萨拉菲斯特暴力

尽管 UGTE 和安纳达党对于伊斯兰化大学的计划现仍不明了, 但不信教者与暴力的伊斯兰组织——特别是萨拉菲斯特 (Salafist) 组织伊斯兰教法虔信者 (Ansar al-Sharia) ——之间的裂缝对于大学校园有着根本且显著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萨拉菲斯特在传统的左派马努巴大学引发的名为“马努巴事件” (Manouba Affair) 的暴力行为。在校园中禁止穿戴面纱导致了 2011~2012 年间的萨拉菲斯特抗议。在冲突爆发期间, 人文学院的院长卡滋达理 (Habib Kazdaghli) 遭到了攻击并被暂时当作人质扣押。卡滋达理之所以引起萨拉菲斯特的极大不满, 是由于他对突尼斯犹太人悠久且丰富历史的学术兴趣及专长。至今, 卡滋达理仍处于警方保护之中。

此外, 萨拉菲斯特激进分子在马努巴大学将突尼斯国旗换成了一面刻画伊斯兰信仰的黑色旗帜——象征着萨拉菲斯特的存在。一位名为拉奇迪 (Khaoula Rachidi) 的学生爬上旗杆摘下这面黑色旗帜, 她被暴打一顿。突尼斯政府尊敬这位年轻女性的勇气, 在时任总统马祖基 (Moncef Marzouk) 的办公室接见了她。尽管如此, 在马努巴大学的整个冲突期中, 当时由安纳达党领导的高等教育

和科学部 (the 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在众目睽睽之下撤退了。时任高等教育和科学部部长的撒冷 (Moncef ben Salem) 公开缓和冲突并与 2012 年 9 月宣布在大学中佩戴面纱是合法的。同时, 据传言, UGTE 和安纳达党的成员一开始就参与到了禁止佩戴面纱的抗议之中。

处于恐怖主义和改革之间

突尼斯民主政治系统的引入使其成为了思想上的敌人以及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恐怖袭击反复针对的目标。这些袭击带来了紧急状态或是政府出于安全原因实行的宵禁, 宵禁使得夜间班暂时取消, 学生无法完成课程要求, 突尼斯大学的生活由此受到了影响。

虽然突尼斯学生大体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国内的工作市场无法吸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依据现有的数据, 持续的经济危机和高度的失业率被视作 IS 在突尼斯而非其他任何国家雇佣更多成员的原因。校园中的抗议及绝食抗议——特别是附属于 UGET 的左派学生——反对大学毕业生的惨淡前景, 这是自引入民主化以来的普遍现象。

即便如此, 正如在《2015~2025 高等教育和科学改革战略规划》 (Strategic Plan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2015-2025) 中主张的那样, 自民主化以来的执政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该战略规划旨在创建大学与工作市场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 并把独立自主的大学视为其当地社区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弗朗茨·法农和南非的“必须倒掉”运动

Thierry Luescher

南非自由州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院校研究副主任

电子邮箱: thierryluescher@outlook.com

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的批评者谴责他是一名反殖民暴力的拥护者——就像“泻药”一样,使当地社会逃离寄生性的殖民国家政体。然而,对于曼德拉生来自由的一代而言,他则是现实预言家,他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中预测南非的新殖民主义境遇:精英沉溺于炫耀性消费之中,自由党派深陷于昏睡和腐败之中,人民大众生活贫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衰败。南非人的幻想破灭了,黑人青年们处于愤怒之中。在2015年诸多的抗议中,一副由学生手持的真情流露的海报这样写道:“1994年,我的父母被推销了一个梦想;而我在原地等待赔偿”。

“罗德必须倒掉”

“必须倒掉”运动 (The MustFall movements) 让南非感到惊讶。它们以一种令人生厌的方式于2015年3月9日始于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开普敦大学的一名学生用粪便弄脏了校园里的赛希尔·约翰·罗德 (Cecil John Rhodes) 塑像,这条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罗德是开普敦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他是矿业巨头、开普殖民地前任总理,也是殖民“资源区”的征服者。开普敦大学的绝大部分都是建立于罗德的地产之上。“罗德必须倒掉”是南非2015年学生运动的开端。黑人学生表达了他们“在校园中是黑色的”体验,并把院校文化交付

给他们的白色面具连同罗德塑像,一并扔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罗德必须倒掉” (#RhodesMustFall) 激励学生提出移除罗德像的需求,2015年9月4日,在罗德像被移除之后,该运动淡出了公众视野。这一“有症状痛苦”的切除是法农“去殖民化”过程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小步,该过程是在治愈后种族隔离的大学并创造出新的知识空间。2015年3月,开普敦大学社会学教授曼祖 (Xolela Mangcu) 在《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中写道,校园里被占领的建筑中进行讨论的特性“(他)在开普敦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或是任何(他)曾就读过的大学都没见到过”。

从“罗德必须倒掉”到“费用必须免掉”

“罗德必须倒掉”一度成为鼓舞整个国家反社会习俗者的事件。甚至是远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杰佛逊·戴维斯 (Jefferson Davis) 等人的纪念碑也摇摇欲坠。在南非,正如法农著名的宣言一样“每一代人都必须跳出默默无闻,发现其使命,实现它或是背叛它”。当开普敦大学里的罗德像不得不倒掉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在)自我发问,在其身处的环境中有什么东西需要倒掉。在斯坦陵布什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开放斯

坦陵”运动重启了校园中的语言辩论 (taal debat), 校园严重分化为两派, 一半是说阿非利堪斯语的白人学生, 一半是说英语的黑人学生。标签运动如雨后春笋般突然出现: “黑人学生运动”(BlackStudentsMovement)、“倾听”(Luister,)、“父权制度必须倒掉”(PatriarchyMustFall)、“改革 Pukke”(ReformPukke)、“斯泰恩必须倒掉”(SteynMustFall)、“跨集体”(TheTransCollective)、“塔克起义”(TuksUprising)等。

然而, 如果说“罗德必须倒掉”及其衍生而来的一系列学生运动代表了黑人知识分子对于南非高等教育及其目击者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愤怒, 那么“费用必须免掉”运动则激发了全国学生的想象, 因为它为学生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层面带来了希望, 引起了人们对于需要免费教育的强烈共鸣。免费教育——或至少是贫困学生相对公平的高等教育机会, 获得国家补贴和奖学金的情况下一一是《自由宪章》(the Freedom Charter)中还未实现的承诺, 这激起了自1995年来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Wits) 委员会于2015年9月宣布2016年的学费将会有两位数的增加, 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该校的抗议不断增多。在几个星期内 (以及更多的学费上涨公告), 南非的公立大学受到了全国学生的抵制, 不得不暂时关闭。

幸存者：校园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 学校领导层都在反复测试后作出回应: 一种参与方式并显现良好的意愿, 一种压制的方式并确保其权威, 一种分裂和管理的方式并强行压制激进分子

——且总是试图把该过程移出焦点之外并转入正式会议之中。多年前, 我玩笑似地将这一策略称之为“幸存者: 校园”——以智取胜、打败对手、持久生存。正如真人秀一样, 它更像是一场隐秘协商的游戏、一种力量的偶然体现、一场善意的欺骗。但正如“罗德必须倒下”一样, “费用必须免掉”在游戏中明显更胜一筹, 它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在所谓的“显然是恐慌的回应”中, 雅各布·祖玛 (Jacob Zuma) 总统与2015年10月23日宣布: 2016年, 公立大学的学费不会上涨。(这样做其实是不合法的, 因为南非高等教育法令 [Higher Education Act] 把设定学费的权力赋予了大学理事会。)

网络时代把学生运动连接起来

2015年的“必须倒掉”运动真正创新的一点在于, 学生活跃分子和支持者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推入了社交媒体和网络之中。如果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在《愤怒与希望的网络》(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中概念化了一种新形式的网络时代社会运动 (以“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 及其他全球运动为例), 那么, “必须倒掉”运动就标志着在网络化的学生运动中组织学生力量的一种新方式的出现, 这一方式同时占据了网络与公共空间。学生富有创造力地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作为一种途径以启蒙并激励他人, 协调活跃分子, 分享宣传册、读物、图片、视频短片及文件, 这一方式循环往复、源源不断, 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着。在公共空间, 国家抗议在可见度最高的权力中心进行: 开普敦国会大厦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Cape Town)、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非洲民族议会总部 (the ANC Headquarters)、位于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 (the Union

Buildings)。同样，校园抗议通常阻碍大学的校门以在公众视野内叫停大学的政策运行，同时，学生们占领了象征大学权力的建筑物，如开普敦大学的行政楼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议事大楼。

未来之路

2016 学年刚开始时一切平静，而学生力量在二月份再度觉醒，许多大学都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因此，正如南非邮卫报 (*the Mail & Guardian*) 的观察员派连 (Pontsho Pilane) 所预测的那样，学生运动会在 2016 年重新点燃，因为三项主要的学生需求仍未解决：学费仍未下降，只是暂时冻结；在大学里终止外包辅助服务工人的提议只是模糊不清的承

诺；最为重要的是，对南非学术界进行“去殖民化”仍是一项挑战，不只限于概念层面。纳度 (Leigh-Ann Naidoo) 在《新议题》 (*the New Agenda*) 中提出关键性的任务在于：继续“集体启蒙”，持续破坏主要的排他性原则并重建大学的教学空间和决策平台。法农的发现或许会到来一些希望；他对于未来之路的方法是完全民主的；认可了民众是有思想的人群。在大学环境下：认可非洲大学不会从年长的白人男性教授会中发展，而是在年轻且精明的黑人教职工和学生中不断进步。他们是有识之士；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大学毁灭。网络化的学生力量可能会频繁涉足于各类完全民主的活动之中，比如决策、课程重新设计以及大学生活的重组。

生死攸关：南苏丹高等教育的困境

David Malual W. Kuany

南苏丹约翰加朗科技大学 (Dr. John Garang Memori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教育学院院长

电子邮箱: malualwuor@yahoo.com

2011年,南苏丹(South Sudan)从苏丹(Sudan)独立出来,人们希望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系统都能占据国家重点支出清单的首要位置。然而,在原有的教育部和基础教育部进行了合并,形成了现有的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后,教育领域失去了其重要地位。作为国家紧缩措施的一部分,教育领域的预算缩减,教职工重新调配,大学理事会也被重新命名。更糟糕的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当南苏丹在2013年12月15日步入我个人认为的一场“疯狂战争”时,公立大学受到了恶劣的影响,学生、教师和教职工被转移,学生财产受到损毁。现在,在特定的时期,大学管理层还面临着这一问题带来的挑战,即是应该关闭大学还是保持其开放状态呢?本文分析了南苏丹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基本挑战,希望近期政府和反叛者间达成的和平状态将得以持续并能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

高等教育简况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新的国家,这里一共有六所大学。其中,五所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另一所是私立院校。排名前三的大学管理层由国家总统任命。每所大学都有一名副校长以及两名分管学术事务和行政与财务的助理。五所大学中,仅有一所大学的副校长是

女性。在写作本文时,所有大学的学生总数约为2.5~3万人。

挑战

南苏丹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在国家边缘和中心缺乏安全的恶性循环。五所大学中的四所学校都位于已被攻击的州,不是被反抗政府的叛军攻击,就是被互相之间存在冲突的当地社区攻击。因此,许多素质良好的外国学者已经离开了大学并返回了自己的祖国,或是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寻找工作。由于在学习和学术周期中缺乏安全并遭受阻断,许多学生离开了南苏丹,转而进入邻国大学就读,如乌干达(Uganda)、肯尼亚(Kenya)、埃塞俄比亚(Ethiopia)和苏丹。许多学生和教职工因为残忍的袭击受到了心理上的伤害,这导致他们非常害怕,从而不敢返回校园,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学习进度被中断或是直接从学校辍学。然而,近期在朱八(Juba)签订的和平协议可能会帮助克服这类恐惧及不安全性。

人才流失与公共融资

大量杰出的、土生土长的教师离开了南苏丹以在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寻找新的发展空间。2015年7月前,较之于东非的学者,在南苏丹的学者收入减少了35%。这导致了

人才的流失。国家教育的激励措施在于受益者应通过发挥其专长服务社区，从而回报国家。如果这些受益者更乐意到其他地方工作的话，那么，上述想法并不现实。这意味着公立大学中的教师数量不足，因而出现了数值巨大的生师比。

国家政府支付公立大学教职工和教师的工资而不负责其他支出。在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护、科研、举办考试、学生住宿的方面没有可用资金。面对这些现实，大学面临着不得不关闭的挑战。迄今为止，还没有大学被迫关闭，但延长假期随处可见，这严重地破坏了学术生活。这些学术上的延误使大众感到失望，同时也加剧了对于提升工作条件的需求。

技术和劳动力市场需求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目前在南苏丹大学中的招生需求已对大学学者及其管理层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学生需要配备了现代教学设备、空调和稳定电能供应的大学讲堂，也需要与大学沟通的途径。一旦缺乏良好的学习条件，学生很容易感到烦躁。教师同样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仅缺乏标准设备，也缺乏如何使用电子资源的知识。

教育的中心目的是培养个人的技能和价值观，以便良好地适应社会并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去，从而得到生存与发展。现在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对现代科技、灵活性和创造力、以及社会智力的深入理解。如上述提及的一

样，缺乏技术工具可能会减少大学生习得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的机会，从而导致能力与失业之间的不协调。

外国大学与跨国教育

越来越多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出现在南苏丹的邻国，如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反映了该地区对于学生的巨大竞争。吸引南苏丹学生到外国大学就读的原因可能是更好的学习环境、课程周期、课程设置、技术水平、高标准的生活和低水平的成本、一体化的学生支持机制、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带来了国际交流的独特机会）。这些情况促使学生跨越国境寻求良好的教育条件。学生们倾向于离开祖国到国外接受教育，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确定在特定时间内毕业，且学术标准高于国内。

结语

尽管南苏丹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自2013年起，更多南苏丹学者和教职工加入了外国大学以进行能力建设。如果他们返回祖国，他们将为祖国提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迫切需要的技能。近期的和平协议，如果得以持续的话，将会为国际校际交流、学习设施升级、入学人数增长（特别是女性）开创新的途径，与此同时，各类资源也可能被投入到教育之中。

非洲博士教育面临的挑战

Fareeda Khodabocus

毛里求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uritius) 质量保证主任、非洲高等教育宣传网络 (the Higher Education Advocacy Network for Africa) 成员

电子邮箱: f.khodabocus@uom.ac.mu

科研是高等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对于一个寻求进步并要应对知识产业的需求及挑战的大学来说, 学者们必须持续参与到科研之中。过去二十年中, 跨越美国、欧洲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非常重视博士教育, 这些国家将其视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同时, 非洲的研究者已进行了各类研究, 用以探究大学作为推动非洲大陆发展工具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 新的课程和工作不断出现并取代了其传统模式。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统计, 到 2020 年, 需要硕士学位的工作预计会增加 22%, 而需要博士或专业学位的工作将会增加 20%。因此, 新的科研领域将应运而生, 要求大学进行创新并适应社会需求。

消除贫困、全民受教育机会、年轻一代接受教育、减少人才流失、性别平等以及鼓励非洲女性参与到非洲的发展之中, 这些都已成为非洲政府议程的重点。为实现非洲大陆的“千年发展目标”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非洲大学受到鼓励并获得支持, 加强其科研能力以应对知识社会的技能需求, 并作为卓越节点以提高其公民的生活质量与福利。由于各国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样性以及政治差异, 尽管这项任务并非易事, 但科研政策和框架可以融入社会背景之中, 从而为每个国家的知识需求提供解

决方案。本文借鉴了一项长达五年研究的成果, 每年由非洲七所一流大学组织的高等教育与信托中心 (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Trust) 开展讨论。

博士教育的趋势

研究结果显示, 在 2000~2001 和 2013~2014 年间, 七所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流大学 (即开普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 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博茨瓦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otswana], 毛里求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uritius], 内罗毕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蒙德拉内大学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为 3 538 人, 其中, 开普敦大学占了 57%, 剩下的六所一流大学占据了另外的 43%。在六所一流大学中, 博士入学人数缓慢增长, 这与同期硕士入学人数的增加形成了对比。结果显示, 在完成硕士学业后继续就读博士的学生并不多。在高等教育机构、私人 and 政府领域层面上, 缺乏激发非洲学生继续深造的激励措施。研究发现了影响六所非洲一流大学博士生数量的主要因素: 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最后都从事咨询工作或是额外教学, 较之于培养更多的博士生, 这更有意义。有趣的是, 尽管在世界经济论坛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发布的《2015~2016 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5-2016*) 中, 毛里求斯大学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位居榜首, 但它培养的博士生数量并不是最多的。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对于任意一所大学而言, 想要提高其知识产出, 充分了解高级知识的学术和非学术工作市场相当重要。高等教育与信托中心近期发表的《南非的博士生教育》(*Doctoral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强调, 为了培养出高素质的博士, 必须要足够重视监管质量, 并且, 这也需要得到博士追踪研究分析的支持, 以表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博士毕业生展现的知识与技能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匹配。

高等教育与信托中心的研究进一步揭示, 除开普敦大学外, 六所一流大学的知识产出和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还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发展, 同时,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大学必须培养出更多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以增加知识产出。高等教育与信托中心的标准表明, 对于一所作为推动发展的科研工具的大学而言, 50%的核心学者必须拥有博士学位, 使得他们可以提供高水平的教学, 并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培养出更多博士生。另一个担忧在于, 除南非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 (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外, 在南非国家中, 政策如何调控研究生项目质量仍不清楚。少有现成的评估系统和质量管理机制用来确保博士学位质量。有趣的是, 高等教育与信托中心的研究表明, 非洲劳动力市场及政府并未系统评估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能力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度。

与欧洲相比, 特别是以英国为例, 质量保证机构 (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为研究生科研, 包括博士教育提供了行为准则。

因此, 英国的大学都拥有完备的指导方针, 明确规定了导师、大学以及博士研究生的权利和责任。内外部评估组成了科研框架的一部分, 并增加了大学培养机制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内部评估的结果构成了来自第三方机构外部评估的基础, 如质量保证署和高等教育基金会 (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或是其他的专业科研机构。在许多情况下, 当外部资助方拥有博士教育的经费来源时, 这也会对博士教育进行外部评估。因此, 人们认为, 对于一所作为发展工具的大学而言, 在国家层面, 它必须拥有合理的框架以监管并评估博士教育的有效性。

科研面临的挑战

非洲发展潜力巨大, 人们号召其利用资源以实现发展。非洲大学可以运用其非凡的能力与丰富的资源以推动培训、发展和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需要博士教育的职业将在非洲出现, 并且, 非洲需要新的教育和科研方法以取代传统的模式。非洲应鼓励并指导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培养出更多的博士生, 这会提升并解放劳动力。数字化和电脑化在所有商业的转化过程中意义重大, 也在财政、教育以及其他关键发展领域的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 大学需要提供更多电子科研数据库的准入机会, 并提升开展研究的信息技术设施。大学需要重审其博士教育的模式, 以获得新的、更加完善的研究生管理、监管和协作模式, 提供丰富的伙伴互动及国际合作。国家与地区层面的监管机制和政策应指导科研政策及计划的实施。大学要有定期的评估以确保博士教育的结果与学术、产业和公私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相吻合。示踪研究必然帮助人们理解博

士毕业生在工作市场的就业情况，也能判定 度。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开展科研的院
科研对于知识经济做出贡献并带来影响的程 校必须大力支持，提供更加稳定的资助模式。

吉尔吉斯斯坦：质量保证——国家标准重要吗？

Martha C. Merrill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高等教育管理副教授

电子邮箱：mmerril@kent.edu

2014年6月3日，教育部下属的许可和认证部（the Division of Licensing and Attestation）被废除；自此，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Kyrgyz Republic）便失去了正式的高等教育机构评估系统。有趣的是，学生、家长、媒体或是政要似乎都不在乎。罗杰·金（Roger King）在2009年出版的《全球大学治理》（*Governing Universities Globally*）一书中指出，高等教育机构愈发受到来自诸多超国家渠道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定的管束，但许多类型都处于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之中。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是否告诉了教育者更多有关全球治理的影响或是该国的具体情况呢？

另一种评估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不是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的成员之一，但它已实行了好几年的博洛尼亚改革，包括把苏维埃时期的学位转为学士和硕士学位。另一改革会是把国家认证转化为独立认证，这是根据《欧盟标准和方针》（the European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中的要求进行的。认证取消后，教育者们希望独立的认证机构能迅速建立起来，但“Jogorku Kenesh”（议会）还未批准设立独立认证机构需要的规章制度。

事实上，许可认证部的废除并不意味着质量评估无路可走。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如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the Kyrgyz-Russian Slavonic University）和吉尔吉

斯—土耳其玛纳斯大学（the Kyrgyz-Turkish Manas University）都是通过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其文凭获得两国认可。中亚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entral Asia）与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签订了双学位协议，如学生就读的专业项目同时也在巴德学院开展的话，学生可以获得巴德学院的文凭。

其他大学在某些专门项目上寻求国家认证；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建筑、交通运输、建筑大学（the Kyrgyz State University of Constr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Architecture）的“德国信息学”（German Informatik）项目与德国茨维考西萨克森应用技术大学（Westfälische Hochschule Zwickau）进行合作，已得到了德国工科专业认证机构（ASIIN）的认可；同时，至少两所大学的商业项目正在做准备以获得商学院及项目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Business Schools and Programs）的认可。非政府组织教育网络（EdNet）凭借一项坦帕斯（TEMPUS）拨款，已建立起了一个认证机构，并且，在欧洲同僚的实地考察下，它已进行了三次试验性认证。

启示

在从苏维埃时期延续下来的系统中，学习项目在运行前必须获得许可，并在其培育出第一届毕业生后接受评估认证，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如某个项目没有通过认证，其

毕业生无法获得国家文凭。最近一次接受评估认证的时间是在2009~2010年的项目应在2014~2015年再一次经过认证。此外，由于该国每个综合性大学都在2012年推行了为期四年的学士项目，第一届毕业生将在2017年完成学业，那么，在明年春季，成百上千的项目需要接受认证或是获得许可。

尽管成千上万的学生可能会在2017年无法获得文凭，但这一事实并未受到公众关注。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吉尔吉斯斯坦会在2015年10月4日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结果公布以及新政府建立之前，人们暂时不会做出许多决定。另一原因在于许可和认证并不会影响现有或是将来的学生支付其教育费用的方式。国家优秀奖学金测试(the National Scholarship Test)是由独立机构——教育评估与教学方法中心(the Center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Methods)监管的，那些在该项测试中表现良好的学生的学费由政府支付。而那些表现不佳的学生则自费学习。此外，人们认为国家机构有国家作为靠山，所有授予吉尔吉斯斯坦文凭的院校必须推行同样的课程，所以，学生(和家长)不再像以前一样依据课程差异选择学校。同时，无论官方项目认证如何，对各类新的私立大学质量的担忧层出不穷。此外，正如艾伦·迪扬(Alan DeYoung)在其《在转型中迷失》(*Lost in Transitio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许多利益相关者都关注高等教育的潜在而非其显而易

见的功能：政府将急剧上升的青年人口排除在停滞不前的工作市场之外；家长把“给予孩子教育”(dat' detyam obrazovaniye)视为具有社会正确性的事；学生认为到首都或是其他城市的机会极具吸引力。教育的实际质量对其任何潜在功能的影响都不大。另外，在一个基于关系的社会中，人们通常“应邀”获得某个职位，在就业上，家庭关系或许比项目质量更为重要。而且，由于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该区域的许多学生会留在那里继续接受教育，或是到其他那些他们能与亲戚住在一起的城市中去。比起正式的质量评估，地理位置更能决定学生对学校的选择。最后，腐败广泛蔓延：人们可以买到学位且认证系统自身也被认为是腐败的。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每个家庭都是凭借他人的口头评价或是非政府组织的评估来确认大学的质量。

结语

因此，较之于其他地方，吉尔吉斯斯坦对于缺乏国家层面上的正式评估机制更为宽容。然而，由于有关国家系统似乎并不重要这一点存在诸多原因，如一些能力较强院校的学位已被其他地区认可，其他院校正在寻求国际认证，因此，其他地方的教育者或许想要密切关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质量评估系统或许不会像曾经一样有影响力了。

哈萨克斯坦的大学治理改革

Darkhan Bilyalov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Nazarbayev University) 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dyb5296@psu.edu

作为提升院校自主性和有效性的途径之一,世界各地的国家政府正在大学中引入西方合作治理模式。前苏联国家紧随这一全球趋势。其中,哈萨克斯坦大幅改变了其教育格局:从严格的部长控制和计划经济转移到了现代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合作治理实践。哈萨克斯坦的做法是凭借把国家部门的治理功能下放到各独立院校并通过创建并授权院校治理委员会实现的。决策者认为这将增加院校在其学术、财务和组织决策上的自主性。下文将讨论这一治理改革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旨在与其他尝试进行类似改革的后苏联国家共享经验。

传统治理

哈萨克斯坦教育格局中的主要活动者就是教育科学部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长久以来,教育科学部在院校治理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决定着政策、详细过程、课程、国家资助的招生、人员政策以及大学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高等教育系统高度集权:公立大学校长直接向教育科学部进行汇报,该部拥有对大学校长进行任用、评估和解雇的权力。

大学校长是首席执行官,在法律上对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负责。在许多情况下,这一

终极职责导致大学校长主导有关大学的重要决策,鲜少决策透明度和合法性。教师们通过由校长主持的学术评议会 (Uchenyi Sovet) 参与大学治理。尽管在名义上,学术评议会是高等教育的最高级组织,但其常常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或是校长的顾问团。

新兴的治理结构

《2011~2020 国家教育发展项目》(the *State Program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r 2011-2020*) 是国家教育主要的政策文件,文件中明确要求,直至 2020 年,90%的公立大学将采用“合作治理机制”并建立受托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将包括外界社会代表:公民领袖、雇主、官方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媒体代表。

在《2011~2020 年国家教育发展项目》设定了建立受托管理委员会几年的时间中,几乎每所公立大学都设立了这一机构。然而,建立如此具有代表性的委员会却没有关于其权力和责任的清楚规定。委员会细则仅允许他们进行建议和讨论,因此他们不具备任何的正式权力。受托管理委员会现主要参与院校事务,通过课程结合、毕业生就业、提供实习机会和科研合作等举措,充当雇主和区域社区的发言人。

一些法律上的争议不允许受托管理委员会获得更多的院校权力。为避免这些争议，九所大学近期建立了新的监管委员会（Boards of Overseers）。这一委员会的合法性（与之前的受托管理委员会不同）受到了《国有资产法》（the Law on State Assets）的保证，公立院校受到该法律的监管。这些改革而来的委员会与西方大学的治理委员会权力相当。特别是他们有权选取大学校长；批准预算；制定战略、入学标准和教师雇用政策；甚至可以规定高级领导团队的工资。

迄今为止，新的监管委员会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一些委员会已批准了战略规划、改变了人员评估政策，或者甚至是为其在院校启动了新的财政模式。而其他一些委员会仍在奋力填补空缺的委员会席位。

回应改革

国家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手段，从委托管理到刺激变化并促进能力建设。新兴的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肩负重任：它将为成百上千的委员会成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组织培训。其他大学不能批准预算、设定学费、任命或是解雇校长、决定教师和行政人员的雇用政策、决定录取标准或是开放新的项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与此完全不同，它处于独立法律的保护之下，该法律决定该校在这些方面的完全自主性。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拥有运行中的共同治理机制，并且，它肩负着通过培训与沟通向其他大学传递这一经验的使命。

尽管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享有大量的自主权，但关于其他系统可获得大学自主权的程度仍不清楚。尽管决策者自由谈论学术自由、

管理和课程资助，有关财务资助和领导层任用的问题却少有提及。一旦此类讨论出现，一些人就会担心，如果教育科学部保有任用和解雇大学校长的权力，那么委员会可能无法实现其所有潜能。另一些人认为，在分层治理上，社会的文化基础还很不坚固。立法障碍带来了又一个挑战，它要求对一系列法律及规章制度进行修正。

学术界似乎基本上接受了自主权和合作治理的想法，但仍对实施的实际情况和时间安排有所顾虑。特别是一些学者预测在传统的和新的治理机构会存在权力纠纷；另一些人认为校长们不愿意放弃其权力可能会带来实施上的延迟。

结语

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政策制定及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然而，广为人知的是，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全球层面，一所大学想要在21世纪取得成功，它需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对于其他同样延续苏维埃治理系统的国家来说，从哈萨克斯坦权力下放的努力中获得的经验或许相当有用。

免责声明：本文是“推动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机构学术治理及管理的最佳实践模式”

（Advancing Models of Best Practice in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Kazakhstan）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它获得了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支持并获得了哈萨克斯坦教育科学部的资助。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与资助方无关。

私立高等教育：即便是法国，即便是营利

Aurélien Casta、Daniel C. Levy

Aurélien Casta: 法国里尔大学 (Université de Lille) 副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成员

电子邮箱: aureliencasta@wanadoo.fr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杰出教授, 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主任

电子邮箱: Dlevy@uamail.albany.edu

许多人认为法国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国家掌控社会且对教育机构施行相关规章制度, 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在外界看来, 较之于其他国家, 法国深受历史上“大陆模式”的影响, 该模式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 也被拉美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借鉴。在“拿破仑时代”(1815年)结束后的200年中, 法国高等教育容纳了重要的“非国家”领域。事实上, 私立高等教育招收了近19%的学生。此外, 随着大量国际投资者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私立高等教育开始合法地追逐利益。

初看之下, 当代现实似乎是对辉煌法国传统的抛弃。但事实上, 无论是私立高等教育的存在还是近期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的逐利风潮都是与法国极具宽容的国家政策相符的。

惊人的数字和特点

私立高等教育占据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19%, 这意味着它们拥有了2013年全年法230万招生总数中的43.6万, 其规模在绝对和相对层面上都令人惊叹。西欧的私立高等教育份额为12% (占据整个欧洲的15%)。事实上, 法国私立高等教育的领先程度远超过这些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大量的法国私立高

等教育具备“独立的私立性”——这是个正式的欧洲术语, 意味着学校大多数资金都是私有的, 但一些邻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主要依赖公共资金。此外, 法国私立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它现在所占的19%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在2000年12%的比例; 且在同一时期, 整个西欧的私立高等教育仍相对滞后。

法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 特别是对其营利浪潮的关注。诚然, 在法国以及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任何私立的 (且是非宗教的) 机构都被视作是营利的, 即便其在官方说法上并非如此。但现在法国高等教育环境中私募股权和跨国公司云集, 及其随处可见的并购行为, 都带来了“热门”的新故事。财经和教育媒体激发了公众的痴迷。在五个最大的高等教育“集团”中, 只有一个是国有的 (同时也是家族式的); 其余四个国际集团包括: 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 (Laureate) (显然是高等教育领域最大的营利机构), 另外三个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跨国私人股份公司 (安佰深 [Apax], 布莱格 [Bregal] 以及公爵街 [Duke Street])。

正如在其他国家中常见的那样, 营利性机构对于公众关注和媒体报道都相当谨慎, 它们会对此增加安保措施和规章制度。然而,

至少就现在而言，法国营利性教育机构完全有理由拥抱外界关注，因为这将帮助它们出现在潜在客户和雇主的视野之中。

法国私立高等教育中的营利性成分比例多大？目前还没有靠谱的预估。政府并未选择将营利/非营利院校分类的综合数据。我们仍然大胆估计：私立高等教育的营利份额可能很大程度上高于20%，小于50%。2000年，私立高等教育领域招收的近23.5万的学生几乎都不是营利性质的。非营利份额在过去25年终有所增长，所以，它现在可能仍高于营利份额。另一方面，上述提及的五大教育集团接收了近八万名学生，约占私立高等教育的18%。无论怎样，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现在的准确份额明显上升。

宽容的国家政策

任何的局外人都认为，即便限制性的国家政策可能大错特错，但此类私立高等教育，尤其是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日可待。所以，人们可能会做出这样的推测：法国是近年来才变得更加包容的，在市场中发挥的作用变小，对市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大。而与此相反的是，国家政策则是在拿破仑时代结束后就相当宽容了。

具体的国家规定已多次更改或是增加，但并未有规定打乱整个包容的氛围。诚然，规章制度会带来一些限制，但它们也传递了国家的认可，由此支持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合法性，现在甚至是营利性的合法性。事实上，几项推出了有一段时间的规定已放宽了政策。例如，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私立高等教育获得了授予国家文凭的权利，在对国家各部委的职业培训上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甚至是与公共部门（包括大学）建立起了伙伴关系。

过去200年中，法国从未禁止私立高等教育或将私立高等教育国家化——这在一些欧洲和其他国家时有发生。与此相反，法国允许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拿破仑时代刚刚结束后，对于私立高等教育的接纳就意味着对天主教大学的接纳；现在，更是意味着企业可以在私立教育领域中开展商业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内容适用于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也适用于非营利性高等教育。营利性的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授予正式的学位和文凭。在允许私立高等教育的同时，许多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禁止了营利性的教育或是对其施加比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严格得多的规定。法国的公共政策在这一点上几乎是中立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于私立高等教育没有任何限制。或许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法国所有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都不是大学。并且，在极大程度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能授予学位或是文凭。同样引人注目是，限制性措施的限制性之大。除以上限制外，对于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就再没有其他的限制了，自1968年起，私立教育机构可与大学合作授予大学学位和文凭。另外，自1999年以来，如果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获得了国际委员会或是教育部的许可，那么，商学院可以自行授予三个大学学位中的其中之一——硕士学位。尽管私立院校的毕业生不能像其公立院校的同伴那样进入国家行政部门，但绝大部分的私立院校毕业生都就职于私企和国际企业之中。

联合会以及公立大学有时会游说国家对待私立高等教育严格一些，它们的表现或许与许多公民对于高等教育教育私有制和管理长期不适相一致。但现行的法国政策在对待私立高等教育上仍相当宽容，现在甚至是在对待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也是如此。

欧洲大学的绩效拨款

Thomas Estermann、Anna-Lena Claeys-Kulik

Thomas Estermann: 欧洲大学协会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治理、资助和公共政策发展主任

电子邮箱: thomas.estermann@eua.be

Anna-Lena Claeys-Kulik: 欧洲大学协会政策分析师、项目经理

电子邮箱: anna.lena.kulik@eua.be

在紧缩的公共预算背景下,大学的绩效拨款常被决策者视为实用工具,不仅是为了把资金与可测量的指标相联系,由此增加支出的透明度,同时也是为了激励并奖励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

定义

此处的绩效拨款指的是基于指标的资金分配,指标测量的是(在不同阶段)教学、科研或是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过程中的输出。例如,常被使用的指标有毕业生数量、授予学分数量、发文和引用数、获得外部资助的数量及其他因素。凭借产出标准以及公共机构与大学之间的绩效合约(包括想要获得的目标),绩效拨款与资助模式相关联。

多种目的

绩效拨款可用于多种目的。它可以作为分配机制,也可以作为导向工具以提升大学在与特定政策目标相联系的某些领域中的绩效,包括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促进知识转化、增加校企合作等。

绩效拨款的份额

需要注意的是,一项拨款机制几乎不会完全是基于绩效的。这意味着一项规则可以由一些输出指标(例如博士学位授予数和引

用量)和输入指标(本科和/或硕士招生人数)组成。基于绩效(意味着通过输出指标)的拨款份额通常小于基于更为传统的输入指标。

本研究包含的欧洲28个系统中的大部分系统认为,在教学上(通过与本科/硕士生数量或授予学分总数相关联的标准),它们的基础资金分配机制至少是部分基于绩效的;在科研上,资金分配机制部分或是主要是基于绩效的,与发文和外部科研资金相关指标通常被纳入考虑之中。

然而,最常见的分配方法仍是基于输入的分配方案,有13个系统采用此类方法。它常与诸如绩效合约或预算谈判及历史分配等其他机制相结合。

指标及相关影响

绩效拨款对教学、科研、院校管理及治理有着多种影响。使用诸如学分和学位授予数量等学业完成标准是为了加快学生毕业、在整体上提升学业完成率及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在那些大学可以自由决定学生数量的系统中,此类完成标准显然刺激了增加招生数量,由于学生可能会中途辍学,所以招生数量通常要成比例的高于期望的毕业生数量。

相对于诸如学生数量等的输入标准，完成标准有其优势，它们促使院校关注教学过程的最终结果，不鼓励院校长时间把学生留在学校而延长其毕业时间。这是学生支持服务的一大助力，也是减少辍学人数的方法（例如辅导、指导和咨询等）。

然而，对于空间和设施有限的院校而言，不断增加的招生数为其带来了挑战。此外，为了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培养出更多毕业生，达标承担着降低教学质量和教学标准的风险。所以，大型讲座可能比小型研讨会更受重视，这就导致教授和学生间紧密联系的减少。

科研经费中的输出指标试图测量一所学校及其研究者的生产力，例如，通过文献计量标准，得知学校获得外部经费的数量、学校与企业的合约数量等。这些指标可以激励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传播并鼓励与外界伙伴的合作。后者不仅有望促进知识转移，也能确保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之外得以使用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所联系，从而加强科研对社会的影响。

文献计量标准或许代表了测量科研输出相对容易的一种方式，但其使用极具争议性，因为这些标准对学者施加压力，他们需要尽早多地发表论文，从而引发了增加数量而非质量的风险，并使得学术人员重科研而轻教学。

机遇与限制

分析表明，绩效拨款的期望常常太高，因此其激励措施要谨慎使用。绩效拨款可以提升资金分配的透明度以及公共消费的责任性。它或许也支持了对于大学的描述和战略定位，特别是通过公共机构与大学间的绩效

合约。绩效拨款的前提是过程和目标都要清晰而非过于复杂，并且，大学是政府部门平等的合作伙伴，这样才能有真实的对话。

然而，绩效拨款的影响很难控制且高度依赖其他因素，比如管理框架、整个资助体系、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份额、院校概况、收入结构、内部管理和治理。如果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阻止这一局面，那么，绩效拨款将会承担降低教学和科研质量的风险。

此外，事实上，院校并不是提前（在学生入学时），而是更晚一些（学生取得进步时，如完成了一年的学业或是毕业）才收到资金，这使得资金很不稳定，并且适应空间不大，缓冲预算的数量也变得很小。大学的消费结构相当严格，大量资金用于教职工，平均占了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这使得快速调整相当困难。这样的结构限制了对创新进行投入的可能性，比如说投入到新的教学模式、新的项目或是高风险研究之中。

建议

决策者、资助者以及大学都应该对绩效拨款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制定策略以扬长避短。他们应关注整个大学资助系统的特点，并向所有活动者确保资金的透明度。限制绩效拨款的份额并以额外资金的形式提供绩效拨款，这可以作为确保大学财务可持续性的途径。此外，在决定资金水平时，大学活动的成本要纳入考虑之中。在院校层面上，基于院校的具体情况、优势及其对于未来的展望，大学领导者要制定内部资金分配的战略方针。

院校自主性是确保以下内容的前提：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设计并执行战略以运行绩效拨款机制；落实降低绩效拨款机制风险的措施，比如合适的质量保证机制。

无论是绩效拨款还是非绩效拨款，都只是一个工具且必须与其他举措相结合，从而确保资金系统的可持续性以及教育和科研的高质量。

注：欧洲大学绩效拨款的完整报告可见欧洲大学协会网页
http://www.eua.be/Libraries/publications-home-page-list/define-thematic-report_-pbf_final-version.pdf?sfvrsn=26。

新书速递

Austin, Ian and Glen A. Jones.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Perspectiv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03 pp. (pb). ISBN 978-0-415-73975-7. Web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本书以全球视角出发,提供了有关高等教育治理理论和实践上的多层面讨论,针对的是优秀的研究生及那些热衷于理解治理各个方面的群体。本书讨论的主题包括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学术自治、治理与管理、治理理论等。

Bellin, William.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ts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ethods of Evaluation*. Milwaukee, WI: Educational Credential Evaluators, 2015. 207 pp. \$125 (pb) ISBN 978-1-883971-29-8. Web site: <http://publications.ece.org>

本书针对的是资质评估者,它展现了伊朗教育系统的详细情况,包括现有数据。书中包含了伊朗高等教育机构的完整名单,以英语和波斯语列出,也包含了有关学位和证书的样本文档,含英译本。由于有关伊朗高等教育的信息少之又少,所以本书是一本相当实用的手册。

Cloete, Nico, Peter Maassen, and Tracy Bailey, e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ontradictory Functions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frican Minds, 2015. 295 pp. (pb). ISBN 978-1-920-677855. Website: www.africanminds.org.za

本书由一系列基于研究的文章组成,关

注的是非洲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尤其关注研究型大学的作用。书中的主题包括非洲顶尖大学的绩效、知识生产的激励措施、国家委员会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学生参与等。

Cloete, Nico, Johann Mouton, and Charles Sheppard. *Doctoral Education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frican Minds, 2015. 282 pp. (pb). ISBN 978-1-928-331001. Website: www.africanminds.org.za.

本书关注的是,如何在2030年将南非的博士学位授予数增至每年5000名——这一目标需要现有政策和实践的巨大改变。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如何提升博士教育的效率、成功的不同途径、提升质量等。尽管关注的是南非,但本书内容与整个非洲及新兴经济体都相关。

Green, Wendy, and Craig Whitsed,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ising the Curriculum in Disciplines: Reflective Narrative Accounts from Business, Education, and Health*.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5. 304 pp. (pb). ISBN 978-946-3000833.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国际化无疑是世界上许多大学的关注点。本书关注的是国际化中少有人关注却极具重要性的方面——课程。从三类学科的角度出发——教育、商业和健康——作者们讨论了课程发展及融入国际视野的诸多方面。院校案例研究提供了有关以下主题的观点:国际化护理学位、几所大学的串联课程等。书中案例来自多个国家。

Helms, Robin Matross. *Internationalizing the Tenure Code: Policies to Promote a Globally Focused Facul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2015. 44 pp. (pb).

作为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洞察” (Insights) 系列丛书的一部分, 本书讨论了美国的终身教职及升职政策如何才能聚焦于增强教学人员的国际工作。书中叙述了现有政策并提供了改进建议。虽然关注的是美国, 但本书仍具备国际相关性。

Helms, Robin Matross. *Internationalizing U.S. Higher Education: Current Policies, Future Direc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2015. 42 pp. (pb).

作为美国教育委员会“洞察”系列丛书的一部分, 本书讨论了与国际化各方面相关的美国政府政策及激励措施, 包括学生流动和本土国际化等。本书认为没有与国际化相关的、统一的国家政策。

Helms, Robin Matross, Laura E. Rumbley, Lucia Brajkovic, and Georgiana Mihut.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Nation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2015. 80 pp. (pb).

作为美国教育委员会“洞察”系列丛书的一部分, 本书讨论了全球背景下有关国际化的国家政策。讨论的主题包括学生流动、学者流动和研究合作、本土国际化、综合的国际化战略。

Hutchison, Charles B., ed. *Experiences of*

Immigrant Professor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Challenges, and Lessons for Succes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269 pp. \$160 (hb). ISBN 978-1-138-806-962. Web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是一系列文章的合集, 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非任教国本地人的外来教授, 书中的一些篇章是基于有关外来教授的研究的, 本书关注的是非本地学者在其职业和个人生活中的经历。

Jones, Elspeth, Robert Coelen, Jos Beelen, and Hans de Wit, eds. *Global and 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6, 183 pp. (pb). \$54 (pb). ISBN 978-6300-299-8. Web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土影响愈发被视为国际化过程的关键部分。本书关注了国际化的一系列本土层面, 其中包括国际化与本土就业、本土层面的学生成果、国际化的本土和全球推动力、对课程的启示以及一些有关本土项目和影响的案例研究。

Kirst, Michael W., and Mitchell L. Stevens, eds. *Remaking College: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23 pp. (pb). ISBN 978-0-8047-9329-2. Web site: www.sup.org.

本书关注的是编者定义的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学。他们认为社会和学术环境都具备相关性, 因此, 两者都需要细致的分析。本书讨论的主题包括成年早期的变化及其对获得高等教育的影响、营利性高等教育变化着的角色、测量院校绩效、为早期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服务的“广泛准入”院校的

作用。

Lane, Jason E., ed. *Higher Education Reconsidered: Executing Change to Drive Collective Impac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228 pp. (pb). ISBN 978-1-4384-5952-3. Website: www.sunypress.edu.

集体效应这一概念源自管理学文献和实践之中，本书将其运用于美国高等教育中，旨在强调高等教育中的重大变化。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的集体领导力、从永存到创新、使用设计思维等。

Major, Claire Howell. *Teaching Online: A Guide to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34 pp. \$29.95 (pb). ISBN 978-1-4214-1633-5.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是针对从事网络教学教师的指导手册。书中的案例和背景都是基于美国的，但其讨论的主题则具有国际内涵。书中的主题包括课程结构、教学时间、知识产权、学生参与、教师知识等。

